

# 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

邢福增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2, Peak Road, Cheung Chau, Hong Kong

## 一、前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這意味著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分裂與戰亂後，中國可以重歸於一個統一的政權之下。政權統一無疑令不少國人多年的夢想得以實現。但是，由於領導新政府的中國共產黨信奉馬列主義，而共產思想在過去一直被國民黨政權斥為「異端邪說」，指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與處境；因此，對普遍國人而言，縱然在情感上對新中國的成立感到歡欣，但是在理智上也不得不對前途存著疑慮，擔心中共將按照馬列主義進行全面而激烈的社會改造。

對中國教會而言，更深切擔憂的是中共會否因所信奉的無神論思想而迫害基督教。畢竟，在馬列思想下，宗教被視為反動及負面的意識形態，會對社會的發展構成根本威脅。而事實上若干解放區亦已傳出教會受到衝擊的消息，因此，教會內瀰漫著對前途不確定的氣氛，是不容質疑的。

就在新政府成立前的9月，作為籌備建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通過了〈共同綱領〉，其中保證了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中共黨員外，更包括了為數眾

多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各界各民族的代表，可謂盛極一時。在芸芸六百六十多個代表中，宗教界也佔有八席（七個正式，一個候補），其中基督教代表五人、佛教二人、回教一人。這五名基督教的代表是：吳耀宗、趙紫宸、劉良模、張雪岩及鄧裕志。這五位基督教人士之中，趙紫宸在中國教會界的地位可說最高。他是著名的神學家，在中國本色神學方面，有獨到的見解。作為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院長，他也積極參與神學教育的工作。此外，他亦十分支持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是普世基督教協進會六位主席之一。趙氏的背景與地位，顯然與其他四人迥異。但無論如何，他願意擔任人民政協的代表，就表明了他對新中國所抱持的態度與立場。抑有進者，趙紫宸在新中國成立後，更積極地反省中國教會應該如何面對這個時代巨變，作出了不少改革教會的建議。

趙紫宸在中國教會史的研究上，一直備受學者重視。但是，對於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言行，特別是他在改革教會方面的努力，卻因著種種的原因而未受到重視。<sup>1</sup>職是之故，我們對趙紫宸在建國後的遭遇所知

---

<sup>1</sup> 這一方面是資料散佚的原因，有關趙紫宸在解放後的著作及生平記載，只能在《天風》中略見一二。有關趙氏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著作，顯然未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張賢勇在一篇書評中，即提及不少未為史家留意的文章及小冊子。見張賢勇：〈大音希聲——評林著趙紫宸傳兼論華人神學史研究的前景〉，《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十八期（1995年1月），頁130。此外，沈德溶也指出，趙氏在六十年代前後，曾撰寫了〈耶穌與政治〉、〈論自傳〉及關於美國神學家尼勃爾的著作，可惜這些文稿都在文革期間散失了。沈德溶：〈趙紫宸與吳耀宗〉，《天風》，1988年第四期，頁13。

另一方面，這又與現實的因素有關。由於趙氏的教會改革觀與吳耀宗的革新主張，存著極大的差異，隨著吳氏成為三自教會的領導人，趙氏在中國教會的地位，特別是其教會改革觀，也因此未受到重視。這從國內教會至今已為吳耀宗出版了數本回憶、文集及傳記，而趙氏則只有數篇紀念文章，可見一斑。一般而言，趙氏只被視為吳氏三自革新運動的支持者看待，這並未突顯二人的矛盾。不過，駱振芳也嘗試指出趙氏「用愛心建立團契」的改革主張的特色。他說：「提出『用愛心建立團契』的主張不能解決中國教會的主要問題……首先教會需要潔淨脫離一切污染，然後才談得到用愛心建立團契。」駱振芳：〈懷念趙紫宸先生〉，《天風》，1988年第四期，頁26。較為重視趙氏的，可推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的教授汪維藩，參汪維藩：〈用愛心建立團契——重溫趙紫宸先生的中國教會改革觀〉，《天風》，1988年第五期，頁14~16。1995年，汪氏更將趙氏三篇思考教會改革的文章彙編成《用愛心建立團契》一書，以紀念三自革新宣言發表四十五周年！此外，現在美國進修的金陵協和神學院研究科畢業生王建國，曾較系統地研究趙氏，並留意其教會改革的思想。參鑑珠：〈教會的體與用——趙紫宸先生思想淺析之四〉，《金陵神學誌》第十七期（1992年12月），頁59~66。

有限，那可說是研究趙氏的「空白帶」。<sup>2</sup> 本文旨在以改革教會為主線，探討趙紫宸在建國前後的思想變遷，希望能通過具體的史實，對這段「空白帶」作部分重建與復原的工作。

## 二、四十年代以後趙紫宸的教會論

要管窺趙紫宸在解放後的改革教會思想，我們需要先了解他在四十年代的教會論。

### （一）甚麼是教會？

基督教到底對中國社會有甚麼貢獻？這是趙紫宸不斷思考與實踐的問題。由此，趙氏開始反省教會處於社會中的意義。趙紫宸在1938年在馬德拉斯 (Madras) 舉行的國際宣教會議上指出，教會必須是「社會中的社會」(a society within a society)，意思是：教會須由一群背景不同的基督徒組成，他們恆切地敬拜上帝，屬靈的需要得到滿足，建立團契的生活，以及從宗教的層面思索及企劃對社會的改革。<sup>3</sup> 對基督徒而言，教會必須是「好社會」的先決條件(sine-qua-non of a good society)，成為永恆真理的世界與歷史變遷世界的中介。<sup>4</sup> 正如一些學者所言，在四十年代前，趙氏建構他的教會論時，較偏重於「無體之用」的進路，<sup>5</sup> 意思

---

<sup>2</sup> 研究趙氏的學者（如吳利明），對他建國後的思想，均未詳細討論，參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1981），頁56~57。另梁夢嬋：〈趙紫宸對拯救的觀念〉，《景風》第五十期（1977年1月），頁6~7。唯一例外的是林榮洪的近著，但是他對於趙氏在解放後的思想，似仍未能掌握其要旨，參林榮洪：《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4），第十一章。張賢勇在評論林著時，也指出林著在處理趙氏對共產主義的看法上，有不足之處。張賢勇：〈大音希聲——評林著趙紫宸傳兼論華人神學史研究的前景〉，頁134~135。此外亦可參駱振芳：〈趙紫宸先生神學思想中的智慧（二）〉，《金陵神學誌》第十九期（1993年12月），頁43~46。

<sup>3</sup> T. C. Chao,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n Social & Economic Thought & Action," *Chinese Recorder* LXIX: 7-8 (July-Aug., 1938): 346.

<sup>4</sup> T. C. Chao,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n Social & Economic Thought & Action," 349.

<sup>5</sup> 鑑珠：〈教會的體與用——趙紫宸先生思想淺析之四〉，頁61。後來林榮洪也以「功能」的角度來理解早年趙氏的教會論，參林榮洪：《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頁264。

是：教會只是開拓天國事業的工具，<sup>6</sup> 以及自救、救人的宗教團體而已。<sup>7</sup> 他關心的始終是教會如何成為改革社會的動力，如何協助中國建立新文明及新的國民生活。<sup>8</sup>

進入四十年代，隨著趙紫宸的神學思想從自由神學轉向受新正統神學的影響，他對上帝的啟示及道成肉身的觀念，都有了較為重大的修改，故他對教會的本質與身分的思考，也有了重要的突破，逐漸從「無體之用」轉向強調教會之「體」。他說：「有形有式的教會，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實底，就是基督，就是教會之體，是看不見的，摸不著的，貫注在信眾之中。」所謂「體」，包括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形體之體」，指信徒有形的集合；另一是指「本體之體」，指基督永恆的實在。<sup>9</sup> 趙紫宸指出，中國基督徒往往缺乏「教會意識」，以為教會只是一群信徒的自由結社，可以自由組織、自由解散，正如其他的組織一樣。他們忽略了教會在「上帝的旨意」及「聖靈的感召」下的特別意義。<sup>10</sup> 他說：

教會既為承認耶穌是基督，永生上帝之子的信眾團體，上帝的下臨與教會的信仰，自然便是教會的所以然，在基督裡的上帝之靈是教會的生命與意識，團結力與發展的權能。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上帝的聖殿，其中存儲著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世的全部教法，以及基督教的全部史實，全副力量。沒有教會，因此，自無基督教福音的保存與流布，亦自無基督教所有的教會意識與事業。<sup>11</sup>

<sup>6</sup> 趙紫宸：《耶穌的人生哲學》（上海：廣學會，1926），頁15；轉引自錙珠：〈教會的體與用——趙紫宸先生思想淺析之四〉，頁61。

<sup>7</sup> 趙紫宸：《基督教哲學》（蘇州：中華基督教文社，1925），頁284。

<sup>8</sup> T. C. Chao,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n Social & Economic Thought & Action," *Chinese Recorder* LXIX: 9 (Sept., 1938): 440-41.

<sup>9</sup> 趙紫宸：《教會的體用及其必要性》（上海：廣學會，1946），頁2~3；轉引自錙珠：〈教會的體與用——趙紫宸先生思想淺析之四〉，頁62。

<sup>10</sup>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上海：青年協會，1948），頁1。

<sup>11</sup>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3。

可見，趙氏更多地從「本體」的角度來思考教會，強調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一個「不完全的」、「擴大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即成為「教會的神學上的基礎」。<sup>12</sup>

## （二）教會的獨特使命

在《基督教進解》中，趙氏強調教會的事工，包括崇拜上帝、宣傳上帝的旨意（講道）、創造新人、信眾的修習（讀經、祈禱）、向外發展、尋求合一及進行基督教的學術研究七方面。<sup>13</sup> 在這七種事工中，被趙氏稱為「最大最要緊的事工」就是創造新人，即是「使人在耶穌基督之內成為新人」。他指出，教會的創造事工，分為「一時的」及「永久的」兩類，基督教在文化上的創造責任，隨著時代的轉變，可以「卸下」，交給專門的團體與個人；唯獨有一事不能放棄的，「就是在耶穌基督的生活裡，藉著聖靈的恩助，創造信眾各個人，使他們逐漸進步，達到滿有基督身量的品格。」這是教育、政治、法律等力量均無法達致的，惟有教會的力量可以做到。<sup>14</sup>

基督教對中國的獨特貢獻是甚麼？這是趙紫宸不斷思索與反省的重要課題。但是，他對若干中國基督徒意圖從基督教信仰中，建構出一套全備的政治革命理論，或社會經濟改革的方案，深表不以為然。因為在他眼中，這些所謂的基督教方案，壓根兒只是依附於某些現存的政治社會改革方案而已，基督教於此，不過是向這些世俗方案妥協，而非適應。<sup>15</sup> 職是之故，他反對吳雷川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書中，將「耶穌為基督」詮釋成改造社會、建立新的國家的觀點。他同時開宗明義地指出：基督教有自身的立場與信念，「不必牽引附麗於現代任何主

<sup>12</sup>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3~4。

<sup>13</sup> 趙紫宸：《基督教進解》（上海：青年協會，1947；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5），頁177~197。

<sup>14</sup> 趙紫宸：《基督教進解》，頁187。在《基督教教會的意義》中，他有同樣的宣告：「教會從前所作的（筆者按：指對社會文化的貢獻），儘可停止不作，交給任何組織去改善繼〔續〕作。惟有一件事是教會永遠要作的，永遠貢獻的，就是：引領人們歸向上帝，信從耶穌基督而做新造的人。」（頁18）

<sup>15</sup> T. C. Chao, "Christianity & the National Crisis," *Chinese Recorder* LXVIII:1 (Jan., 1937): 10.

張」。<sup>16</sup> 任何人企圖「要解釋基督教是一個改造社會，改革經濟制度的動力，固大具苦心」，但卻「使永恆的基督變了暫時的局部的政治上的君王」，甚至「變更基督的教訓而謀與現在流行的政治方式和妥協」，根本揚棄了基督教的本質，「而投降於政治勢力之下」。<sup>17</sup>

雖然趙氏反對基督教依附於世俗的救國方案之中，但卻不表示他認為教會不應關心國家及社會的問題。在三十年代初，他嘗言：「不知道國事，不努力國事的耶穌子弟，是耶穌的罪人，是中國的廢物，是聖教的障礙。」<sup>18</sup> 到四十年代，他仍堅持教會不應逃避世界，不能失去先知的功能，否則便是逃避責任，「是犯罪」。<sup>19</sup>

那麼，基督教會如何持平地表達其對國家社會問題的關注，並發揮其獨特的貢獻？趙紫宸確信，基督徒既不能「順潮流」，因著關心政局而忘記了自己的信仰，也不能「反潮流」，專心宗教而忘記了社會國家目前的重要問題。<sup>20</sup> 一方面，趙氏肯定無論在任何的社會模式裡，總會有痛苦、有悲哀，基督教則恰好成為反對邪惡、不義的力量。<sup>21</sup>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基督的「新人」正是基督教必須及可以揭櫫的理想。在這裡，仍得再三強調，雖然趙氏以創造新人作為教會在世首要的使命，但是，他仍並沒有揚棄教會對改革社會的責任。對於中國教會爭論多年關於救人與救社會的先後問題，他說：

<sup>16</sup> 趙紫宸：〈「耶穌為基督」——評吳雷川先生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真理與生命》第十卷第七期（1936年12月），頁413。

<sup>17</sup> 趙紫宸：〈「耶穌為基督」——評吳雷川先生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424~425。

<sup>18</sup> 趙紫宸：〈宗教教育者應如何應付國難〉，《真理與生命》第六卷第六期（1932年4月），頁3。

<sup>19</sup> 趙紫宸：《神學四講》，初版（上海：青年協會，1948年；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5），頁89。

<sup>20</sup> 這是他對基督教學生運動的批評。他又說：「（基督徒學運的）錯誤不在於關心國事，而在於不關心宗教。不關心宗教，基督教學生運動，與中國全國的學生運動自然就沒有區別，自然就是一個贅疣了。」趙紫宸：〈基督教學生運動有方向麼？〉，《消息月刊》第十九期（1948年4月），頁3。原件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檔628：「中華基督教會等宗教組織」，卷163：「各基督教團契的刊物」。

<sup>21</sup> T. C. Chao, "Christianity & the National Crisis," 11.

我們常聽人議論紛紛的說要先改革個人，然後方能改革社會，因為沒有好人不能有好社會；又常聽人反駁說要先改革社會，然後社會好了，就有好個人，因為沒有好社會，個人不能獨自改革。這種議論與雞在卵先，卵在雞先的爭執一樣。其實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個人，須要一同改革的，不能有先後之別，因為二者互相糾結，無可離立，不能一先一後的。<sup>22</sup>

在他心目中，教會的「用」是始終沒變的，只是他更著重「體」與「用」之間的關係。他再三強調，在教會外是沒有「救法」的。雖然教會本身不是已經達到無瑕疵，無玷污的純潔品格，但是個人的拯救，仍得先通過教會。「乃是因為人與教會須要一同在耶穌基督裡生長，改革而變化，漸漸地得有基督純全的身量。」換言之，人不能離開教會而獨自使耶穌基督的形象啟現在他生活裡，因此在「教會之外，無有救法。」<sup>23</sup>

那麼，這些「新人」有甚麼特徵呢？他說：「在教會裡人們受基督的薰陶，可以得獲充分的社會意識，堅固的團結能力，徹底的和好生活。」<sup>24</sup> 趙紫宸深信，在這個不完整的現實世界裡，「新人」之所以是可能的，乃建基於聖經「在基督裡」的真理。一個皈信基督的人，就是進入基督的生活，在基督裡經過全部救贖的歷程。他援引保羅在羅馬書六章3至5節<sup>25</sup>所言，指出人若皈信基督，進入教會，必先接受洗禮。洗禮就是一個出死入生的歷程，一方面象徵「全部救法」的歷程，另一方面也象徵人在基督裡與他的心志生活冶於一爐。只要每一位信徒都「在基督裡」，各人均「本耶穌基督的心為心」的話，一種特別堅強的「共同意識」，特別有力的團結，特別的快樂與和平便會形成。基於信徒群體這種既存活於現實世界，但又有其超越意義的本質，他以「舊世界之

<sup>22</sup> 趙紫宸：《基督教進解》，頁189。

<sup>23</sup> 趙紫宸：《基督教進解》，頁189。

<sup>24</sup>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10。

<sup>25</sup> 「豈不知我們這受死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我們藉洗禮歸入死，與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中的一個超出而貫入的新世界」來形容教會。<sup>26</sup> 基督教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有二，就是為中國造就有基督精神的個人，以及以基督教的團契，為中國創造新社會。<sup>27</sup>

可見，趙紫宸對教會使命的理解，雖然因著神學思想的轉變而強調教會的「用」，但是在基本取向上，卻與他一直重視的「人格」問題呈現一致。他深信個體人格的建立，是實現天國的基本條件。「耶穌來是要改革人心，使人迎接上帝到他們的心裡，到他們的社會裡，由此而使人類成為新人類，社會成為地上的天國。」他認為，基督教的「救法」不是「法子」，而是「生活」，是耶穌基督的人格，生活在人的心裡，再通過信徒生活在社會裡。<sup>28</sup> 換言之，天國就是耶穌的人格擴充到社會，成為群體相愛的社會。<sup>29</sup>

為甚麼耶穌的人格能夠成為實現天國的基礎？因為趙氏確信，「中國的問題是人心的問題」，一切社會改革，都需要依賴革命者的「公心」。<sup>30</sup> 因此，中國今天的急務在於「改造心理」與「環境」兩者同時進行。「無好環境即不易產生好心理；無好心理即不能產生好環境，二者互為因果」，而基督教在建設「心理」上，就有重大的貢獻，不容忽視。<sup>31</sup> 這樣看來，趙氏的終極關懷並沒有改變，「人格救國」仍然是他的信念與理想，只是，四十年代後，他更強調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在其中的位置而已。他期望更多中國人可以通過教會，認識基督人格的

<sup>26</sup>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11~12。

<sup>27</sup> 他說：「國家的基礎是強有力的善人，基督教若能使一萬個強有力的真基督徒，抱著犧牲服務與惡奮鬥的精神，進入各界各機關各組織裡去，基督教便做了偉大的貢獻。」此外，他又說：「基督的教會，就是一個最堅固最有力的社會。」趙紫宸：〈新時代的基督教信仰〉，吳耀宗編：《基督教與新中國》（上海：青年協會，1940），頁170~171。

<sup>28</sup> 趙紫宸：《基督教進解》，頁129。

<sup>29</sup> 梁夢嬋：〈趙紫宸的拯救觀念〉，頁5。

<sup>30</sup> 趙紫宸：〈我們的十字架就是我們的希望〉，《真理與生命》第六卷第五期（1932年3月），頁4~5。

<sup>31</sup>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的心理建設〉，《真理與生命》第六卷第八期（1932年6月），頁12。



真諦，進而接受基督的救贖，加入教會。他也盼望有更多的信徒能夠將耶穌的人格與精神實踐在社會生活上，這樣，天國實現在地上的可能也愈大。這是他多次強調教會是「國中之國，社會中的社會，文化中的文化」的意思所在。<sup>32</sup> 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他為何在1939年接受聖公會的派遣，往雲南昆明負責文林堂的牧養工作，復於1941年接受堅振禮，由明華會督按立作會吏及會長之職了。<sup>33</sup>

### （三）本色教會的建立

趙紫宸在四十年代後對教會論的反省，不僅受其神學思想的轉變所影響，也與他不斷思索的本色教會問題，有著密切的關係。趙氏一直深信，基督教如何成全及拯救中國文化，乃是信仰本色化的一個重要切入點，也是中國社會接納基督教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正如吳利明指出，本色化問題，其實是趙氏認為基督教要達到它在中國的任務之過程中的一個階段。<sup>34</sup> 職是之故，或許我們可以說，趙紫宸的教會論，不僅是在純粹理論上建構的，更是以具體中國教會的處境作了反省的憑藉。至於基督教信仰如何通過教會及信徒融入中國社會，影響中國文化，也成為他思考教會論時一個重要的神學議題。

基督教究竟對中國社會、中國文化有甚麼獨特的貢獻呢？這是趙氏一生不斷思考的。要是基督教對中國沒有特殊的貢獻，中國人也就沒有必要接納基督教了。趙紫宸在三十年代中開始，便表露出他對這個問題的掙扎。當他對來華的宣教事業作總檢視時指出，誠然基督教對中國作過不少貢獻，但是，「基督教所貢獻的哪一件是中國沒有的？」當他嘗試以科學、人文主義及社會服務作為答案時，他發覺這一切都不是基督教的特殊貢獻。即使是他一直強調的耶穌人格，他也開始質疑：「但人

---

<sup>32</sup> 趙紫宸：《從中國文化到基督教》（上海：廣學會，1946），頁15。另《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22。"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n Social & Economic Thought & Action," 346.

<sup>33</sup> 劉清芬：〈趙紫宸先生傳略〉，燕大文史資料編委會編：《燕大文史資料》第三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253。駱振芳指出，趙氏接受聖公會的聖職，表示他在信仰上接受教會的權威。駱振芳：〈懷念趙紫宸先生〉，頁26。

<sup>34</sup>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頁8。

或者要說，我們不但要耶穌的人格，而且要孔、孟、關、岳、諸葛亮、文天祥、孫中山、列寧、甘地的人格。學甘地與學耶穌不相等麼？學耶穌更有獨特的地方麼？」最後，趙氏不得不承認：基督教之所以偉大而為中國所必需，就在於「耶穌自己的宗教」，惟有這個「上帝降在人心」的宗教，才是問題的重心所在。<sup>35</sup> 由於這時他開始接觸新正統神學的思想，他就從「徹全的另一個」(The Wholly Other) 的角度來理解上帝，他說：

上帝不是我們的最高的自我，祂不是我們的理想。祂不是我們文化的最優良的元素。祂在平常的物與平常的人中間向我們說話。但祂不平常。祂是那神聖的聖者。祂審判人。祂定人罪。在祂的聖事的光照之中，我們的生活是何等的骯髒卑鄙，我們的文化是何等的虛浮，我們的理想是何等的襤褸。因為祂是審判的主，超出我們的一切的理想，一切文化之上，所以祂也是一切重新建造的淵泉，能使腐敗衰落的文化，得再造的重生的力量。<sup>36</sup>

這樣看來，我們便可理解趙紫宸在思想教會的使命時，為何會有「一時的」及「永久的」事工之分，也更明白他為何再三強調教會的「本體」了。

在四十年代，經歷八年抗戰後，趙氏思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時，進一步發揮這種本體論的觀點。他首先以體用的概念來區分文化與文明。他說：「文化是精神的，文明是物質的，二者相依，為體為用，為裡為表。有文化然後有文明，文明是文化中所發出來的。」<sup>37</sup> 「體用俱整，生活乃振」，「表裡不應，生活乃失」。今天中國的危機，正在於缺乏理想與信仰，「既無理想的前導，又無信仰的內興」。<sup>38</sup> 換言之，中國的問題是「本體」不能發揮作用的問題。

---

<sup>35</sup> 趙紫宸：《評宣教事業評議前四章》（北京：燕京大學宗教系，1934），序頁3~4。

<sup>36</sup> 趙紫宸：《評宣教事業評議前四章》，序頁4~5。

<sup>37</sup> 趙紫宸：《基督教進解》，頁44。

<sup>38</sup> 趙紫宸：《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頁1~2。

為甚麼中國文化的本體會淪落至如斯地步呢？趙氏歸咎於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人太急於西化。面對西力的入侵，中國知識分子「拚命鼓動新思潮，提倡全盤西化」，但是，在建立新的信仰之前，他們卻已消滅了舊的信仰。「急於成功所以只有毀壞的成功，消滅信仰所以並無代替的信仰。毀壞之後，人們沒有了立命的根基，生活便是恆空的浮雲，沒有了信仰，人們自然只有各人顧自己。」中國失去了信仰，形成前所未有的危機：「中國已經毀滅了中心的信仰，是中心腐化的，意志薄弱的，前途不可預期。」<sup>39</sup>

正當中國文化面對如斯劇變之際，基督教可以啟發中國人的信仰嗎？教會又扮演甚麼角色呢？趙紫宸強調，基督教若真的期望可以「注射新血新生命到中國文化裡去」，必先視自己是一種信仰，包括「此種信仰所發生的生命，所開展的行為，所推布的運動，所創造的文化」，而不單單是一個倫理教訓，或一種主義。這種信仰要在人群裡發生影響，傳揚其精神，開拓其文化，度人民的苦厄。而基督的福音正是要產生這樣的果效，「人若相信，就是聖徒，群若宗仰，就是教會」。因此，教會就是「有形的天國，為社會中的社會，文化中的文化，擴而大之，推而廣之，即由天國上降下的新耶路撒冷。」<sup>40</sup>

中國教會若要真正發揮上述的作用，作為教會成員的基督徒，必先反求諸己，檢視一下自己的信仰狀況，能否通過「身教」及「言教」影響社會。所謂「身教」，趙氏深信，只要信徒能夠帶著熱誠的信仰，高超的人格，進入中國社會政治、教育、工商農各界，宣揚基督，見證信仰，必能收到果效；至於「言教」，則要看基督教的文字工作，可否打入中國文化，成全中國文化。<sup>41</sup> 歸根究柢，這一切完全要仰賴教會所栽培的人，是否為完全信仰基督，完全獻身傳播宗教的「學者與行者」？他說：

<sup>39</sup> 趙紫宸：《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頁10～11。

<sup>40</sup> 趙紫宸：《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頁13～15。

<sup>41</sup> 趙紫宸：《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頁17～18。

基督教要在中國文化上，無論是舊文化，新文化，舊新交鬥的文化，新舊協濟的文化，終須造就出誠信基督，熱烈到猖獗，犧牲到癡狂的傑出人才來。<sup>42</sup>

就是靠著這樣的信徒，「用超世的精神做入世的生活，用入世的眼目見超世的真身」，世界與超世界（即上帝的國）才得以聯繫，「成為聖徒之國，信眾之家」。這是基督教補充及成全中國文化的關鍵。<sup>43</sup>

#### （四）改革教會的呼聲

儘管趙紫宸對教會的本質，以及她在中國社會建設方面有著許多的期許，但是，他仍面對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中國教會存在著種種問題。這反映趙氏面對一個實存的掙扎與兩難：一方面，他確切認定基督教是中國道德及社會重建的唯一基礎，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認，作為基督教具體象徵的中國教會及中國信徒，卻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必須予以改革。隨著中國在四十年代後期局勢的變化，這種改革教會的迫切感，更躍現於趙氏當時的言論之中，不能抑止。

1946年底，趙氏在一篇討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文章中，再次肯定基督教在中國文化劇變中的價值。他指出在這個新文化的創造工程裡，基督教可以提供一個道德的基礎、人生的意義、社會的信仰以及歷史的哲學。<sup>44</sup> 但是，他卻不能不承認，以現況而論，基督教教會在實踐使命上實在「無能」，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由於教會「無人」。他指出，將來基督教若每下愈況，其理由不在她與中國文化「抵觸」，也不在於國人認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倒在於教會本身的「空虛」。無論

<sup>42</sup> 趙紫宸：《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頁20～21。

<sup>43</sup> 趙紫宸：《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頁26。

<sup>44</sup> 他說：「以基督教的本質而論，這種工程，原是有力量作的；今日的中國，要求這樣大，期待這樣切，也原是基督教絕大的機會。上帝的聖命，應可作倫理永久的基礎；成全上帝的聖命，應可作人生究竟的意義；愛上帝，愛人群，由得救的新人成自新的精神團結，在地的天國，應可作社會共同的信仰；超世入世，以犧牲的大愛，造從天下降的新耶路撒冷，以納人類於上帝之懷的理想，應可作集合殘闕以至偉大的歸宿的歷史哲學。」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下）〉，頁1。

基督教在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工作上有多少參與，曾經發揮甚麼影響，只要教會不能解決人才、領袖的問題，即失卻其宗教的性質，也失卻在中國發展的基礎，<sup>45</sup> 這是中國教會在「精神上的窮」。<sup>46</sup>

此外，中國教會又要面對「物質上的窮」。二次大戰後，西方母會對中國教會的供應已減少。這對一直仰賴西方差會經費的教會及機構而言，無疑是另一個不能不面對的危機。<sup>47</sup> 再者，中國教會的貧窮，使教牧人員不能獲得較合理的薪金，亦間接地影響了人才的吸納。<sup>48</sup>

教會不合一，也是趙氏認為教會存在的問題。他嘗言，「合一是神功，分裂是人事」。<sup>49</sup> 趙紫宸極關注宗派間的合一問題，<sup>50</sup> 但是，他更強調不同神學傳統對教會使命的不同理解而衍生的衝突及紛爭所帶來的負面後果。特別是那些較「守舊而熱心」的教派，他們較注重靈感祈禱，過著嚴謹的宗教道德生活，但是卻「與基督教各大宗派不發生關係，也不肯發生關係，以為現在各大宗派都已奄奄垂斃的了。」他們堅持基要的教義，若對此持有不同觀點者，即予以拒絕。這與一些期望在宗教裡「找到政治人生種種意義與力量」的立場迥異。不同立場的結果是把信道的青年「各異而離貳」。<sup>51</sup> 教會也出現了「一派偏左，一派偏右」，及一派「逃避現實」的情況。<sup>52</sup>

<sup>45</sup>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下）〉，頁1~2。

<sup>46</sup> 他指出，在抗戰時有少部分牧師離開了教會的工作，改了行。「後繼的人才，不但是上乘的稀少，而且即使立刻就有，也接不上來。在四十歲以上的牧師至新進的牧師，中間隔了十年至二十年的空缺。這是量的方面。至於質的方面，亦有難言之苦……」。趙紫宸：〈危機與轉機〉，《真理與生命》第十四卷第一期（1948年3月），頁5~6。

<sup>47</sup> 趙紫宸：〈危機與轉機〉，頁5。

<sup>48</sup> T. C. Chao, "Training & Maintenance of the Christian Ministr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37 (1948): 259.

<sup>49</sup>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13。

<sup>50</sup>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14~15；另《基督教進解》，頁193~195。

<sup>51</sup> 趙紫宸：〈危機與轉機〉，頁6。

<sup>52</sup> 趙紫宸講：〈普世基督教會協會的動向〉，《天風》第146號（1948年11月13日），頁7。

職是之故，他再三強調，必須增強中國教會的「教會意識」，這是一種願意復興教會，並將上帝的道傳遍的意識，也是再次肯定教會位置的意識。<sup>53</sup> 趙氏對於教會與各種機構的關係極表不滿。他說：

教會現在的情形如何？教會的醫院裡有人，學校裡有人，只有教會自己的範圍裡太沒有人。教會管不著學校，學校不關心教會，一個身體而手足不相顧，心臟不健全。到了現在最容易辦的是醫院，其次是中小學校，其次是大學，極不容易辦的是神學，沒有法子想的是教會本身。<sup>54</sup>

這裡所呈現的，又是人才缺乏的問題。<sup>55</sup> 趙紫宸認為只能以一種近似認信的盼望來面對這個問題，而不能真的提出根治之道。他指出，中國教會需要更多人願意自我犧牲，將上帝的道傳揚開去，並且與現實的社會及政治場境發生關係。<sup>56</sup> 他還盼望，在五十年後，訓練人才的問題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教會必須不怕失敗，勇敢地仰賴基督，不斷嘗試，直至達成目標為止。<sup>57</sup> 他也深信，中國教會雖然軟弱，但是上帝仍會使用她來完成祂的旨意。<sup>58</sup>

<sup>53</sup> T. C. Chao, "The Articulate Word: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36 (1947): 486-87.

<sup>54</sup>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下）〉，頁3。

<sup>55</sup> 趙氏對於中國神學教育如何舒緩人才短缺的問題，並訓練合資格的傳道人，有他的一套理想，參T. C. Chao, "Training & Maintenance of the Christian Ministry in China," 256-63。

<sup>56</sup> T. C. Chao, "The Articulate Word: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488.

<sup>57</sup> T. C. Chao, "Training & Maintenance of the Christian Ministry in China," 263.

<sup>58</sup> 他說：「到了現在，時勢嚴重，教會不振作，不能不叫人望洋興嘆。上帝有安排，我們不該悲觀失望，因為艱難困苦，是生活開展必經的過程。為今之計，我們要努力喚醒信眾，教育信眾，加深他們的教會意識，啟發他們愛教會的心。我們要設法培養上等的人才，要有一個切實的服事社會，服事民眾的計劃而集中力量去實行，要設法維持中國的道德生活，要培養心靈，誠信上帝，作衛道殉道的犧牲。瓦器之中，至寶可存。上帝要藉著最軟弱的中國教會作成他的旨意，作成那人力所萬不能作的偉工。」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31~32。

### 三、趙紫宸與共產主義

#### (一) 解放前趙紫宸對共產主義的態度

討論趙紫宸在新中國成立後提出的教會改革觀前，先要處理他對共產主義的態度，特別是他在解放前後的轉變。

在三十年代，趙紫宸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十分明確。首先，撇除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在具體內容上的歧異不談，單就他對國家重建方向的理解而言，趙氏對共產主義已經有極大的保留。正如前述，由於趙氏確信中國的問題在於人心的自私，因此，他認為惟有道德人格的重建，而非任何形式的社會革命，方是救國的根本出路。他對於包括共產黨在內的黨派自詡擁有「統盤改造的計劃」深表懷疑，因為他覺得「中國的救法，只可以一部分，一部分，一小段，一小段，做去的〔去做的〕」。<sup>59</sup> 其中的關鍵，在於基督的人格，能否成為救國的基礎。並且，在人格救國的大前提下，即使共產黨員，也擺不脫「自私自利」的問題。<sup>60</sup> 換言之，共產黨員自身也需要基督人格的救贖，又如何奢談救國呢？無論如何，基督教的精神力量，必定「勝過一切物質的力量，機械的力量。」<sup>61</sup> 顯然，在社會改革的進路上，趙氏傾向「逐步或漸進的社會工程」(piecemeal engineering)，而非「烏托邦式的社會工程」(Utopian engineering)。<sup>62</sup>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分歧，不僅在救國的進路上，更在具體內容上水火不相容。趙紫宸在批評吳雷川的觀點時，對吳氏主張基督教與新唯物論有關的看法，極表保留。他指出，在唯物主義的哲學中，根本「沒有上帝存在的餘地」，絕對不能並為一談。<sup>63</sup> 抑有進者，共產主義根本

<sup>59</sup> 趙紫宸：〈我們的十字架就是我們的希望〉，頁8。

<sup>60</sup> 趙紫宸：〈我們的十字架就是我們的希望〉，頁4。

<sup>61</sup> 趙紫宸：〈新時代的基督教信仰〉，頁167。

<sup>62</sup> 參波珀 (Karl Popper) 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台北：聯經，1981)，頁52~58。

<sup>63</sup> 趙紫宸：〈「耶穌為基督」——評吳雷川先生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417。

「不肯容讓基督教保其獨有的性質」，即使基督教願意妥協，亦沒有可能；「因為一妥協，一投降，則基督教即橫死於鐵蹄之下」。<sup>64</sup> 他又說：

共產主義的推動力是恨，是武力，基督教的推動力是愛，是宗教的信力。共產主愛而接受運用基督教的愛，則庶幾乎變化的基督教，試問共產主義能為此麼？共產主義不能為此，那末只有基督教去遷就共產主義，遺棄其愛的推動力而接受恨的推動力；試問如此辦法，基督教尚有絲毫之存在麼？<sup>65</sup>

職是之故，真正的基督教必須反對共產主義。<sup>66</sup>

到國共內戰初期，當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時，趙氏一方面仍然堅持反共的立場，以「極權的統制」來形容中共，甚至指共產勢力「使人格傾覆」，是「道義淪亡的魔道」。<sup>67</sup> 在1947年間，他甚至對於未來共黨統治可能帶來的迫害，表示了願意殉道的心志。<sup>68</sup> 不過，另一方面，他對基督教在共產政權下的存活，仍表現極大的勇氣。他認為，上帝的道在不同的時代中，均會對人群說話。<sup>69</sup> 面對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貪污、剝削、不平等、殘暴……教會必須站出來，發出先知的呼聲，勇敢地面對鎮壓、逮捕，甚至死亡，即使為作見證而殉道，也在所不辭。當提到中共在解放區內禁止傳教時，他強調：「沒有一個共產政權，無論如何強硬與殘暴，能夠阻止愛的團契及上帝之道的

<sup>64</sup> 趙紫宸：〈「耶穌為基督」——評吳雷川先生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425。

<sup>65</sup> 趙紫宸：〈「耶穌為基督」——評吳雷川先生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427。

<sup>66</sup> T. C. Chao, "Christianity & the National Crisis," 10.

<sup>67</sup>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29。

<sup>68</sup>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Christian Century* 66:37 (Sept. 14, 1949): 1066。另注58之引文。

<sup>69</sup>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天風週刊》第四十九期（1946年11月30日），頁3。趙氏對一部分教會人士積極表達他對內戰時局的關注，認為教會能夠反映人民的心聲。參T. C. Chao, "Christian Faith in China's Struggle," in *Christian Voices in China*, ed. Chester S. Miao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48), 24-26。



傳播。我相信，這些地區的福音大門，不僅沒有關閉，反倒繼續開放！」<sup>70</sup> 因為基督教是唯一救世的宗教，「惟有基督教教會是集合人類，創造和平，保障人生唯一的機構。國家有興亡，民族有盛衰，主義有隆替，文化有生死；惟有基督的身體——教會要永遠巍存。」<sup>71</sup>

當然，仍得指出，趙氏的反共立場，並不意味著他傾向支持國民黨政權，因為按著先知呼聲，教會必須批判政府的腐敗。問題的關鍵是：基督教的宗旨不在於維持現況，乃在於從上帝的道中，本於靈與真理來改造國家。<sup>72</sup> 可以說，趙氏反對的，是違反基督道理的政權，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sup>73</sup>

另一方面，趙紫宸又從歷史哲學的層面，建構他評價現實歷史的基礎。1947年12月，他在一篇文章中，突顯任何人類歷史若沒有上帝在其中賦予意義，便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傳統的歷史哲學，強調治亂盛衰，「至終是永遠兜圈子」。即使是西方現在盛行歷史哲學，在正反之後，「不是綜合，乃是另一反另一正，另一綜合，永遠是螺旋形的轉動」。這裡的西方歷史哲學，顯然是指馬克思的辯證唯物史觀，趙的評價是：「一正一反是一個永遠的缺陷，永遠張著巨口，沒有架在兩端的橋梁」，「這樣的歷史是毫無意義的。歷史無意義，人類不能有意義。人類的生活無意義，那麼，所謂是非真假善惡，只是一個空，聖賢豪傑，盜賊娼妓，只是一個同。同歸於無意義！」那麼，怎樣的歷史才是有意義的歷史，怎樣的生活才是有意義的生活？趙氏指出，世界是上帝所創造的，惟有通過上帝藉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再造」，「使人歸回與

---

<sup>70</sup> T. C. Chao, "The Articulate Word: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488-89。他又說：「在了解基督教信仰本質的時候，對於一切不公道，不正誼〔義〕，一切強權，一切壓迫，發生內心的不安，逐漸的抵禦，成熟的革命。超世界，超歷史的上帝，在基督裡，在信眾裡，在教會裡，永遠在發揮抵禦罪惡死亡的力量。」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頁4。

<sup>71</sup>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32。

<sup>72</sup> T. C. Chao, "The Articulate Word: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489。

<sup>73</sup> 「凡與基督的道理相違反的政權治權，沒有不利誘教會使其改變本質，成為惡勢力的爪牙的；若教會不從，專以上帝的命令為命令，也沒有不威脅教會，逼迫教會，毀滅教會的。」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頁4。

上帝和睦，在一個永遠完成的大愛大團結之中」，歷史才有意義。<sup>74</sup>可見，在趙紫宸心目中，沒有上帝的「再造」，則任何人類歷史均有其缺陷與不完美之處。他對任何政權的批判，也是建基在這個終極的基礎之上。

及至1948年，隨著中共在內戰中逐漸佔優勢，甚至有取代國民黨而統治中國的可能，趙氏對共產黨的態度，似乎就起了一些變化。他在出席1948年普世基督教協會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會議時，在演講中對中國現正進行的「大革命」表示「不能不同情」，因為「有人不能參加這個革命，有一般人則替他們革命，他們是為人民的福利，我們不能不同情。」<sup>75</sup>這裡，趙氏所指的大革命，顯然是共產革命運動了。他特別提到他同情革命的原因，在於從事革命者是為人民的福利。可見，他對國民黨的腐敗，亦已極度不滿，並且隱約流露對中共的認同。不過，趙氏仍堅持教會的先知立場，強調基督教的「超然」地位，「不應偏左，也不應偏右」。<sup>76</sup>

1948年3月，趙紫宸在復刊的《真理與生命》中，以編者的名義，發表了〈危機與轉機〉的評論，其中他特別提及教會必須同情那些思想左傾的青年，並引導他們，使他們信仰救主，甚至獻身為主作見證。因為，青年的舉動，表示他們其實需要宗教，「需要心靈上的慰藉，生活上的歸宿，需要一個解救若〔苦〕難，破滅罪惡的信仰」。這些需要，正是教會的良機，「教會得了他們，是教會的轉機，不能得他們，是教會的危機，過了一二年，恐怕就是失機！」<sup>77</sup>這種只爭朝夕的心態，反映他覺得形勢在一二年間即會突變，因此他呼籲教會必須思想對唯物主義及經濟定命論的意見、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以及對民主政治、人權、

---

<sup>74</sup> 趙紫宸：〈創造與再造〉，《真理與生命》第十四卷第一期（1948年3月），頁16~17。

<sup>75</sup> 趙紫宸講：〈普世基督教會協會的動向〉，頁7。

<sup>76</sup> 趙紫宸講：〈普世基督教會協會的動向〉，頁7。

<sup>77</sup> 趙紫宸：〈危機與轉機〉，頁6。

道德的主張。「即是急起直追，也已經遲得太多了！」<sup>78</sup>最後，趙紫宸又隱示了他對未來局勢發展的評估，他指出中國面對「一重極大的難關」，有人以為「經過了一個大難，一切就明朗了」，豈不知歷史正以正反合的方式前進，「那末綜合之後還是一正一反」，「在這一正一反的中間，萬物被驅而作機器，人也被驅而作機器。將來的人文是怎樣，是一個大疑問。」但是，他仍強調教會的使命：

人的上頭須要有一個主宰。人的面前須要有一個信仰。基督教對於這一點是有貢獻的；但是須要堅強的教會，大有覺悟，能衛道，能殉道，熱情蓬勃的教會。要在危機面前轉機麼？那末全教會要長跪在上帝面前，痛心懺悔，恢復他初始的愛心。上帝終要拯救。人到水盡山窮的時候，上帝要彰顯神能；我們的事情是盡心盡力，快快使信眾的心一齊向著上帝，奮興起來。<sup>79</sup>

1948年5月，趙紫宸預見中共將在內戰中勝利，建立新政權時，既表現對現實的接受，又堅持了教會不變的使命。他指出，新形勢將促使中國文化從根本上崩潰：舊有中國的人生觀、宇宙觀，完全要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思想，唯物論將在中國「發達興旺」。基督教面對此種形勢：

應當覺悟到自身的責任，應當在實際上與民眾打成一片，在理論上作一正面的陣容，與中國舊有文化作對壘而施以挑戰，藉以補充其不足，又與最有勢力的唯物論相競，而當仁不讓，以求為中國造一個新文化強健的基礎。<sup>80</sup>

1948年11月，北平的解放已經逼在眉睫。趙氏在一封信中，肯定了革命的前景，並反對將宗教學院撤退。他強調當前巨變的「淨化作用」，並指出需要調整基本的方向。他說：「我相信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去認識馬克思主義，及探討基督教與部分共產思想的密切關聯。」<sup>81</sup>

<sup>78</sup> 趙紫宸：〈危機與轉機〉，頁7。

<sup>79</sup> 趙紫宸：〈危機與轉機〉，頁7。

<sup>80</sup> 趙紫宸：〈漫談神學〉，《真理與生命》第十四卷第三期（1949年10月），頁10。

<sup>81</sup> T. C. Chao to "Y. C. & David," November 26, 1948, Yenching file, in Philip West,

可見，在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趙氏已確切相信，中共將成為執政者，共產主義亦將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國教會必須面對，也不能不面對這個事實。<sup>82</sup> 不過，從上述言論來看，似乎他仍認定，即使在共產政權之下，基督教仍可以發揮作用。他以「當仁不讓」來形容基督教，足見信心十足。這信心，也充分表現在他的具體行動上。當時，他從阿姆斯特丹回國，抵達上海後，幾經困苦才能轉往北平。就在他回到燕大不久，北平便解放了。<sup>83</sup>

## （二）從北平解放到建國

1949年1月，國軍在平津戰役中大敗，天津、北平先後解放，趙紫宸正式活在共黨的統治下。據他的學生及教會同道憶述，他對解放後中國的前途，是滿懷信心的。<sup>84</sup> 這顯然與他一直以來對共產主義的抗拒態度迥異。研究趙氏的學者，對此的理解有三：一、壓力論，<sup>85</sup> 即趙氏是在很大的壓力下，才採取合作的態度；二、適應論，<sup>86</sup> 即趙氏對共產黨的肯定，主要是從教會存在的意義及使命出發。他確信基督教在共產政

---

*Yenching University &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35.

<sup>82</sup> 據趙氏的一位學生憶述，在1948年冬，當時國民黨軍隊已經撤入北京城內，燕大校園處於真空地帶。燕京的同學組織起來護校，夜間巡邏值班。有一晚，同學們值夜完畢後，集合在趙氏的家中，談論時局。當時趙氏說：「我看中國的前途不在國民黨，而在共產黨。中國的社會，在人民得到新生活後，將會很快地發展文化、科學和工農各方面的建設。」楊周懷：〈懷念趙紫宸老師〉，《天風》，1988年第八期，頁21。此外，他在1948年11月26日寫信給在美國的學生蔡詠春時說：「奇怪的是，你所認為的『壞消息』，這裡幾乎所有人都看成希望的兆頭。」他更鼓勵蔡氏回國。Winfried Glüer 的 *Christliche Theologie in China: T. C. Chao, 1918-1956* (Gutersloh, 1979), 頁265, 注1, 轉引自張賢勇：〈大音希聲——評林著趙紫宸傳兼論華人神學史研究的前景〉，頁135。

<sup>83</sup> 趙紫宸：〈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三輯合訂本，第十五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22~23。

<sup>84</sup> 楊周懷：〈懷念趙紫宸老師〉，頁21。沈德溶更形容趙氏「欣然鼓舞地迎接新社會的來臨」，沈德溶：〈趙紫宸與吳耀宗〉，《天風》，1988年第四期，頁12。

<sup>85</sup>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頁56；另林榮洪質疑，趙氏對共產黨改變立場，是否受到某些壓力，參林榮洪：〈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頁297。

<sup>86</sup>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頁56。

權下，仍需要履行其特殊任務；三、迎接論，<sup>87</sup>即趙氏因為新政府的表現，改變了他先前的態度，甚至對中共帶著更多的期許。

除壓力論外，我們都可以從趙氏的言行中找到證據來證明以上論點。事實上，我們要注意，這裡所指的「壓力」究竟是甚麼意思？是指中共用強硬的方法向趙氏施壓，迫使他發表認同新政權的言論，甚至採取與之合作的態度嗎？還是在中共的統戰攻勢下，趙氏不得不作出改變？

由於資料缺乏，實在難下結論。不過，從中共解放北平時的政策來看，基本上都是以團結各階級（反動分子除外）為首要的考慮。<sup>88</sup>毛澤東特別擬定的〈約法八章〉，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sup>89</sup>據趙紫宸的學生楊周懷憶述，在解放進城前，趙氏與燕大校長陸志韋及教授張東蓀等，已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商談。和平解放後，趙氏在應邀參加北平軍管會在北京飯店舉辦的招待會後，曾對楊說：「我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樸素英勇的軍隊。」<sup>90</sup>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前途的態度。事實上，當時解放軍開到燕京及清華等大學座落的海淀區時，不僅受到一些師生的歡迎，也確實贏得不少民眾對其軍紀的讚賞。此外，黨中央當時制定了一個處理各大學的政策，強調第一步是「接而不管」。軍管會轄下的文化接管

<sup>87</sup> 林榮洪：《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頁293。

<sup>88</sup> 持平而言，中共當時確實十分重視平、津的接管。有關工作，是在黨中央及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中央指出，平、津為全國觀瞻所繫，凡帶政治性的決定，除中央已具體規定者外，必須事先請示。中央又先後發出大量文電，指示接管工作中的政策問題，交待重大問題的處理原則。例如進入北平後，不再發任何宣傳口號和不能把農村土改辦法施行於大城市郊區的指示，接收官僚資本企業的指示，接管平、津司法的指示等等。毛澤東特別強調不能重蹈李自成等因勝利而驕傲而腐化的覆轍。他曾對薄一波說：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受官僚資本；對民族工商業要好好保護，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樣，原封不動」。此外，毛又指出要團結好資產階級，跟他們保持長期的統一戰線；現在是人民民主專政，不是搞無產階級專政。詳參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1），頁5～20。

<sup>89</sup> 何東、陳明顯：《北平和平解放始末》（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頁145～154。

<sup>90</sup> 楊周懷：〈懷念趙紫宸老師〉，頁21。

委員會，又確實執行了這個政策，沒有干涉各大學的校務，只派聯絡員去進行工作上的聯繫。<sup>91</sup> 當文管會派人到燕大時，情況亦十分平靜。<sup>92</sup>

這樣看來，北平的解放，顯然是在一個較為寬鬆的氣氛下進行的，中共也確實給予民眾一個良好的印象，將解放引發的震盪減至最輕微。正如薄一波說：接管人員進入平、津後，「把革命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破壞限制在最小的範圍，能夠保存的盡量保存，可以利用的盡量利用，哪怕是暫時的也好。」<sup>93</sup> 這與中共一貫的統戰手段，即既團結又鬥爭及矛盾辯證的原則相符，而團結與鬥爭的比重，又在於領導人對不同矛盾關係的判斷。從北平解放到1950年間，毫無疑問，是新中國較為寬鬆的時期。故說趙氏直接承受中共的壓力而不得不表態，大抵與當時的客觀情況不符。那麼，中共出於統戰的需要而拉攏趙氏，這就帶給他壓力，會否是一個較合理的推論呢？<sup>94</sup> 筆者以為，在缺乏直接資料的前提下，我們從具體的情況中，也許仍能找出一點端倪。

正如筆者在上文指出，早在北平解放前，趙紫宸已逐漸流露對共產革命的肯定態度，這顯然與他一貫對待共產主義的立場迥異。但是，我們必須注意，趙氏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反共立場，基本上是出於三方面的考慮：一、在救國取向上，共產主義與他的人格救國主張不符，前者是烏托邦式，後者是漸進式；二、在教義上，共產主義與基督教存在根本

<sup>91</sup>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130～132。

<sup>92</sup> 有關聯絡員進入燕大的情況，當時在燕大任教的公理會女教士包貴思(Grace Boynton)在日記中說：12月17日，我們的「解放者」派來一隊軍管人員，整個會堂都擠滿了人，包括全校的工作人員及師生。那位負責人顯然是生病了，他曾經在一所美國教會學校就讀，但並沒有完成學業。現在他要在眾多大學生及教授面前講話，致使他不斷地流汗，並且結結巴巴的。但是他很快便回復自信，並向我們陳述一個美好的將來及那些新主人的德行。但是聽眾們並沒有像我期望般興奮。這位青年人在鞠躬後便離開。"Yenching, From Old Order to the New, from Grace Boynton's Diary"，燕大文史資料編委會編：《燕大文史資料》第三輯，頁220～221。

<sup>93</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12。

<sup>94</sup> 林榮洪說：「趙紫宸在基督教圈中素負盛名，在學術界著作等身，無疑是共產政權的統戰對象。」林榮洪：《曲高和寡》，頁297；另張賢勇也說：「今人皆知共產黨統戰武器的厲害，要說趙氏沒有受過壓力也難。」張賢勇：〈大音希聲——評林著趙紫宸傳兼論華人神學史研究的前景〉，頁134。

矛盾；三、基督教的「先知」立場，是要批判現實政治。這些都是他在共產革命成功前的考慮。

然而，共產革命的成功（建立新政權），即使不能代表烏托邦理想的實現，起碼亦說明了按著這個理想而進行的改造，已經進入現實的議程。換言之，存在決定意識，革命成功的現實合理化了革命的手段，趙氏不得不修改他對革命的立場：中國社會必須再造，但「設若漸進的過程不能見效，革命便成為不可或缺。」<sup>95</sup> 中共在實際行動中的表現，不僅增強了其統治的威望與合法性，也說明這不一定是個腐敗的政權。<sup>96</sup> 趙紫宸在北平解放後的言論，顯示了他以新中國成立的正面意義<sup>97</sup> 作為承認新政權的基礎。更重要的是，趙氏確信，在基督永恆真理的審判之下，任何政權（無論是國民黨或是共產黨）均有其自私、不義、虛假，甚至邪惡的一面，但是，也正因為這樣，基督教豈不是同樣能在共產政權之下，繼續扮演其社會良知的角色，<sup>98</sup> 並通過教會及信徒來成全新的文化嗎？<sup>99</sup> 趙氏的教會論，特別是他對教會與社會的關係，或更具體點，教會對社會的獨特貢獻的見解，事實上為他接受共產政權提供了理論結構上的可能。他在1949年1月寫給友人的信內表示，對共產黨領導的

---

<sup>95</sup> T. C. Chao, "Days of Rejoicing in China," *Christian Century* 66:9 (March 2, 1949): 265. 後來（約1962年）他又說：「我早已下定決心接受新政權的領導，決不做反對政府的任何事情。意思是中國再也經不起復闢與革命翻來覆去的變動了，推翻了新政權，在我看就等於摧毀已經不堪再亂的中國。」趙紫宸：〈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頁128。

<sup>96</sup> 趙氏嘗說：「無論我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如何，新政府總比蔣政權要好得多。」趙紫宸：〈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頁128。

<sup>97</sup> 他指出，革命的最大成就是符合了人民的意願。一方面，是打破封建主義對人民的剝削與壓迫，另一方面，是內戰最終隨著國民軍的失敗而結束。T. C. Chao, "Days of Rejoicing in China," 265.

<sup>98</sup> 早在1937年時，他已經指出：基督教本身就是一股革命的力量，她反對的，就是一些社會改造方案中的邪惡、不義、虛假和破壞。所以，「不論在任何的社會模式裡，總不免有痛苦、有悲哀，也就需要我們一點點的慈善工作，我們的愛與友誼。」T. C. Chao, "Christianity & the National Crisis," 11.

<sup>99</sup> 他曾指出，基督教必須在中國文化上有所作為，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甚麼文化（「無論是舊文化，新文化，舊新交鬥的文化，新舊協濟的文化」），而在於教會有沒有人才！趙紫宸：《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頁21。

新中國有信心，<sup>100</sup> 即說明了他嘗試把共產主義的內容與新中國革命的成就區分。這樣看來，趙氏接納中共政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對現實形勢與處境的轉變的反省，而非來自統戰的壓力了。

但是，也得指出，中共的統戰策略不是沒有對趙紫宸產生作用的。統戰的目的是爭取團結。就趙氏較為關心的教育及宗教問題而言，中共在北平解放以後的措施，也確實讓他相信，新政府沒有干涉燕大宗教學院的事務，<sup>101</sup> 同時實施一套容忍、保障而非禁絕、迫害宗教的政策。<sup>102</sup> 因此，在1949年2月，趙親自帶領燕大宗教學院的同學，及部分燕大及清華大學的本科生，一連數日到北平的教會演講，向他們解釋在新秩序下，黨實行的宗教自由政策。<sup>103</sup> 3月，趙又在一次北平教會同工的退修會中，主講了「唯物論與基督教」、「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及「基督徒的歷史觀」等專題，對基督徒如何認識及面對共產主義，提出了他的見解。<sup>104</sup> 顯然，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在在教他認定了，共產黨不得不面對如何管理四億多非共產黨員的現實問題。中共為了長治久安及團結國人，必須按著中國的具體情況，以溫和為原則修改其主義。<sup>105</sup> 職是之故，是統戰的吸引力，而非壓力，促使趙氏接納共產政權。

---

<sup>100</sup> 他說：「現在燕大全體的教員與學生，都喜樂地面對『解放』的事實……雖然我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我們卻有理由為革命力量的勝利而歡欣。」T. C. Chao, "Days of Rejoicing in China," 265.

<sup>101</sup> 在1948年12月聖誕前夕，合眾社記者曾進入燕大，訪問了陸志韋校長，陸表示共軍沒有進駐校園，留校之中外籍教授及學生均可自由在城郊行動。該區共軍政治代表曾到校對學生演講。參〈外國記者穿過火線探燕大〉，《天風》第154期（1949年1月8日），頁15。解放後，宗教學院的外籍老師仍然在校，並且趙氏也羅致了一些華人來院任教。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Christian Century* 66:37 (Sept. 14, 1949): 1067;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202-3.

<sup>102</sup> T. C. Chao, "Days of Rejoicing in China";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Christianity & Crisis* 9:11 (June 27, 1949): 83.

<sup>103</sup> 趙氏此舉，引起了若干教會人士的懷疑，指他成為共產黨的「特使」。參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1066。另楊安鼎：〈懷念我的老師趙紫宸先生〉，《天風》，1988年第四期，頁17。

<sup>104</sup>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1066.

<sup>105</sup> T. C. Chao, "Days of Rejoicing in China," 265.



在這樣的情況下，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在內容上的歧異，也成為次要的矛盾了。趙紫宸因此呼籲建構一套（並不系統的）「本土神學」（native theology），其中必須指涉基督教、中國文化與馬克思富有動力的內在論（Marxian dynamic immanentism）的三角關係。<sup>106</sup> 究竟「馬克思富有動力的內在論」是甚麼意思呢？這顯然不是出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或許是指某種不強調鬥爭的馬克思主義。這反映出趙氏意圖區別馬克思的思想，從而方便基督教與之協調。因此，他認為「基督徒共產黨員」（Christian Communist）並不是沒有可能的，就好像初期教會時代，基督教與希臘哲學雖不相符，卻令人費解地結合一樣。<sup>107</sup> 仍得指出，這裡趙氏所指的「基督徒共產黨員」，大抵不是指他自己或任何人，而是強調兩者不僅不是水火不容，反倒是可以協和與結合的。他相信，以中國人向來重實踐而輕哲理的性格，中共也不見得真箇明白及執著於共產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的分歧。<sup>108</sup>

### （三）趙紫宸與人民政協

趙紫宸不僅接納共產革命的事實，更以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的身分，參與了新政府的籌備工作。

1949年6月，新政協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在北平召開，出席者包括來自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等二十三個單位的134人。19日，會議通過了〈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確立了黨派、區域、軍隊、團體及特邀等五大類別的代表。<sup>109</sup> 在人民團體

<sup>106</sup> T. C.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3.

<sup>107</sup>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1067.

<sup>108</sup>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1067.

<sup>109</sup> 據該規定，各單位及其代表的名額為：甲、黨派代表14個單位，142人；乙、區域代表9個單位，102人；丙、軍隊代表6個單位，60人；丁、團體代表16個單位，206人；總計45個單位，510個代表名額。另設1個特別邀請單位，其代表名額與人選，由常務委員會另行商定。每一單位，其代表名額滿10人以上者，得推候補代表2人，不滿10人者得推候補代表1人，候補代表得列席新政協會議。參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5~6。

的類別中，宗教界屬於其中一個單位，佔有八席（七個正式，一個候補），其中基督教代表五人、佛教二人、回教一人。這五名基督教的代表是：吳耀宗、趙紫宸、劉良模、張雪岩及鄧裕志。

據吳耀宗等人表示，團體代表的產生方式可分兩類：一類是凡已有組織，被政協籌備會認為具有民主性的團體。他們的代表，都是根據已經協商好的名額，由該團體自行選出。至於沒有成立組織的團體，或已有組織而籌備會還不能承認的團體，或完全沒有組織的個人，便可按第二類方式產生，即由籌備會協商而擬定。基督教的代表，就是屬於第二類。<sup>110</sup> 換言之，全國性的基督教團體（即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地位，並不為籌委會所承認。那麼，籌委會承認團體的標準又在哪裡呢？

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向參加新政協的代表所作的〈關於人民政協代表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了參加政協會議的成員的條件，是「擁護新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及同意一切人民民主的力量，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協代表的邀請，就是根據這個政治標準。<sup>111</sup> 這樣看來，基督教協進會之所以不被籌委承認，並不純粹由於許多教派沒有加入而代表性不足，而是因為她不符合上述的「政治標準」。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中共眼中，由於基督教來自西方國家，與帝國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故協進會具有濃厚的帝國主義背景，違背了反帝國主義的政治標準。因此，「即使基督教的代表，是由全國性的基督教團體選舉出來，他們還是不能代表中國整個基督教。」現在這五位代表，「並不代表這些團體，他們所代表的是基督教裡面與他們思想相同的一派力量。」這派力量的特色，是：

他們主張民主；他們反日、反蔣、反美帝國主義；他們接受新民主主義，接受共產黨在政治上的領導，主張與共產黨合作；他們不滿於基督教的保

---

<sup>110</sup> 吳耀宗等：〈我們參加人民政協會議的經過〉，《田家》第十六卷第八期（1949年11月），頁8。

<sup>111</sup> 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頁37。

守、腐敗和它與帝國主義、封建力量的聯繫；他們認為社會革命是耶穌的福音的一個重要的成分，而這個成分，同共產主義的主張，是大致相同的，他們這些思想，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的，他們思想的轉變，雖然有時間上快慢的不同，但他們所以形成今日的思想，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期的奮鬥歷程的。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中，他們當中有些人，是一直在黑名單上的，是天天受到特務統治的威脅的。他們在思想上、信仰上，雖然與參加民主運動的其他人士並不完全相同，但在共同的目標上，在實際的行動上，他們和這些人是完全一致的。<sup>112</sup>

可見，基督教的五位代表，是籌委會根據他們一直以來（而非現在才開始）在政治立場上傾向認同社會主義革命、主張擁護共產黨統治的表現而「擬定」的。正如周恩來後來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所言：「我們對宗教界民主人士是以他們的民主人士身分去聯合的。允許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事，邀請宗教界民主人士參加政協或各界代表會是另一件事，後者是以政治為標準的，不管他是牧師還是和尚。」<sup>113</sup> 這樣看來，他們的真正身分，其實是基督徒民主人士，而民主人士的身分，更是一個首要考慮的因素呢！

若按照這個標準，則吳耀宗、劉良模、張雪岩及鄧裕志四人，均是名正言順、實至名歸地被選召為代表的。<sup>114</sup> 唯獨趙紫宸，便頗具爭議性了。第一、我們知道，中共對「民主人士」的理解，主要是從反蔣及親共作出發點的。這樣，趙紫宸雖然一貫主張民主，但是在他心目中，「真正的民主，必須有耶穌基督住在裡面」、「真正的教會才是真正的民主國」，<sup>115</sup> 這根本與中共的立場迥異。第二、長期以來，趙氏均站在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上，他「接受新民主主義，接受共產黨在政治上的

<sup>112</sup> 吳耀宗等：〈我們參加人民政協會議的經過〉，頁8。

<sup>113</sup> 周恩來：〈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積極作用的幾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85~186。

<sup>114</sup> 吳耀宗及劉良模被邀請的經過，可參江文漢：〈吳耀宗——中國基督教的先知〉及劉良模：〈懷念愛國愛教的吳耀宗〉，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編：《回憶吳耀宗先生》（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82），頁49~50、107。

<sup>115</sup> 趙紫宸：〈民主潮流與基督教精義〉，《天風》第八十九期（1947年11月29日），頁3。

領導，主張與共產黨合作」，是肇始於1948年間，而非「經過了一個相當長期的奮鬥歷程」。況且，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對既成現實的接受與合理化，而非出於一種尋索的結論。再者，他反對社會革命是耶穌主義的一個重要部分的立場，更是始終不渝的。

趙紫宸被列入中共擬定之名單內的原因，筆者以為，大抵與他在中國基督教界的地位有關。雖然趙不是聖公會的領袖，但卻是中外聞名的神學家，又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院長，普世基督教協進會六位主席之一，與普世教會關係密切，享負盛名。這與其他四位基督教民主人士相比，顯然有著更大的統戰價值。對趙氏進行統戰不僅有利於團結國內信徒，更可在國際教會間產生積極影響。

另一方面，由於趙氏不是共產黨的長期「同路人」，與中共領袖間的關係也不密切，故籌委會對他的認識，大部分是通過基督徒民主人士所介紹或推薦的。筆者推斷，吳耀宗是最具可能性與影響力的推薦人。在1949年初，中共已邀請吳氏到北平，商談「關於基督教的一般問題」，而吳也在3月中，抵達北平與中共交換關於基督教的看法。<sup>116</sup> 可見，中共在考慮對基督教的措施上，對吳氏很重視。<sup>117</sup> 另外，我們也得留意，趙紫宸與吳耀宗之間，儘管在神學立場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但是卻絲毫無損兩人的友誼；<sup>118</sup> 甚至在吳耀宗的思想引起教會人士爭議時，趙還表現出對吳的尊重。<sup>119</sup> 趙氏在三、四十年代尚且與吳氏維持著友好的關係，更何況在解放前後這段劇變的日子，他更需通過吳耀宗來

<sup>116</sup> 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天風》第175期（1949年8月13日），頁3。

<sup>117</sup> 梁家麟指出，此時中共大抵已欽定了吳作為基督教的領袖了。參梁家麟：〈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建道學刊》第六期（1996年7月）。

<sup>118</sup> 詳參沈德溶：〈趙紫宸與吳耀宗〉，頁11~12。

<sup>119</sup> 趙氏雖然在神學立場上，與吳氏有極大的差異，但是他對吳仍表現出相當尊重與包容，例如在1947年吳耀宗訪問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事前趙便囑咐學生們，如果發現吳的見解與他們不一樣，不要和吳辯論，要尊重他的意見。結果，同學表現得十分成熟，只是表示了他們與吳的不同看法，沒有辯論。在談到當前中國基督教最迫切的任務是甚麼時，吳說是解放全中國，同學則說是為耶穌作見證。參駱振芳：〈懷念趙紫宸先生〉，頁26。

增加對共產主義及中國共產黨的了解與認識！事實上，在1949年4、5月間，趙紫宸與若干基督徒民主人士已經增加接觸，特別是吳耀宗及沈體蘭，前者已被選為新政協籌委會委員，後者更是新政協籌委會副秘書長。<sup>120</sup> 有一次當趙出席由中共支持召開關於青年工作的大型會議時，接觸到四位來自青年會的代表，他形容四人滿懷熱誠，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青年的需要認識深入。未幾，他得悉青年會幾位代表將參加在布達佩斯 (Budapest) 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時又指出，青年會在革命運動方面的表現，並不代表基督教信仰向馬克思主義投降，反倒是體現了公民與基督徒的雙重責任。<sup>121</sup> 可以說，趙紫宸在北平解放後與基督教民主人士的密切關係，也成為他被選上的一個重要因素。

不過，也得指出，基督教界政協代表的產生，事實上要推遲至1949年9月初才落實下來。吳耀宗、沈體蘭、鄧裕志等具備基督徒身分的籌委在參加6月的第一次籌委會會議後，即自北平抵滬。在上海期間，他們出席了各種基督教組織的會議，並主持了多個演講。<sup>122</sup> 到他們8月底離滬赴平前，仍表示基督教方面的政協代表，「還要跟各方協商，才能作出最後的決定」。<sup>123</sup> 豈料9月上旬，上海天風社發表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吳耀宗在抵北平後，「以基督教聯絡員的身分，向中共統一戰線部提出基督教方面代表五人出席新政治協商會議。其名單如下：吳耀宗（青年協會幹事）；鄧裕志（女青年協會協事）；趙紫宸（燕大宗教學院院長）；劉良模（前青年協會幹事，留美九年，最近返國）；張雪岩（田家半月刊社社長，最近由美返國）等五人。」又指出：「就此未證實的名單來言，各方頗有訾言，因尚未能充分代表基督教教會的各方面」。<sup>124</sup>

---

<sup>120</sup> 沈體蘭是上海麥倫中學校長，早年參加青年會，擔任學生工作，被視為基督教的民主人士，與中共關係密切。

<sup>121</sup>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1067.

<sup>122</sup> 〈吳耀宗等人將定期北上〉，《天風》第173期（1949年7月30日），頁16。

<sup>123</sup> 〈教會簡訊〉，《天風》第177期（1949年8月27日），頁12。

<sup>124</sup> 〈新政協會議基督教代表〉，《天風》第180期（1949年9月17日），頁12。

這樣看來，吳耀宗在推選基督教政協代表方面，確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他肩負起按著周恩來所指示的「政治標準」，在基督徒中物色人選，並上報中共統戰部的責任。在這五人的名單中，吳、鄧、劉等青年會幹事均完全符合有關的標準，但是吳耀宗大抵也考慮到這數人的教會背景不強，而且在教會建制內的地位又不高的問題。不過，要找到一個同時具備崇高教會地位，又符合政治標準的人，顯然是沒有可能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吳耀宗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選上了趙紫宸這個在北平解放後才醒覺的人，因為趙氏既在中外教會界擁有相當高的地位，也能勉強在政治標準上過關。

那麼，趙紫宸願意接受邀請的原因又何在？一方面，顯然他對中共提出的統一戰線，是相當認同的。宗教界既被新政府接受，並能在籌組新政府的問題上有所參與，確實是一件值得「欣幸而榮耀的事啊」！<sup>125</sup>另一方面，這也可從他對教會在新中國可以扮演甚麼角色的看法入手。毋庸置疑，趙氏確切認定，基督教在新的時代中，仍有獨特的作用，而教會仍是成全中國新文化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的形勢，又促使他進一步思考教會本身存在的種種問題，讓他更系統地提出其教會改革的思想。他在1949年3月嘗致函上海的朋友，表示「中國基督教運動須重新檢討事工，以應當前的局勢」，<sup>126</sup>即反映了其心志。因此，趙紫宸自然盼望，擔任基督教代表，可以有助其推廣改革教會的理想。正如這五位代表說：

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做一個橋梁：一方面，我們自己加緊學習新中國給我們帶來的新功課，忠誠地體驗耶穌基督的福音，和這個福音對今日時代的意義；同時把我們所學得到的，體驗得到的，奉獻給整個中國基督教運動，奉獻給思想還不能與我們一致的國內外同道。如果我們能作基督教在新時代裡一個傳送信息的忠心僕人，我們就心滿意足了。<sup>127</sup>

---

<sup>125</sup> 趙紫宸：〈論信仰自由〉，《天風》第209期（1950年4月15日），頁1。

<sup>126</sup> 〈簡訊一束〉，《天風》第164期（1949年3月26日），頁15。

<sup>127</sup> 吳耀宗等：〈我們參加人民政協會議的經過〉，頁9。

作為基督教的代表，趙紫宸與吳耀宗都是期望有所作為的。不過，他們對如何在新時代裡作基督的僕人，福音的時代意義是甚麼，卻呈現了迥異的理解。隨著建國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黨國權力對社會不同領域（包括宗教）的入侵，以及在教會內衍生的不同回應，趙、吳二人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教會，又扮演著完全不同的角色。

#### 四、建國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代表了共產政權的新時代的開始。對各教會的領袖而言，如何面對當前的巨變，並尋索基督教在新中國的位置，成為他們迫切要解決的課題。雖然新政府在〈共同綱領〉內已承諾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他們也確切明白宗教界人士要享受此等自由的前設，在於他們必須與過去舊社會的反動勢力劃清界線，並以行動來證明他們在新中國覺悟的決心。<sup>128</sup> 基督教必須改革以求應變，遂成為刻不容緩之事。問題是，如何變，以及誰來領導這場變革而已。全國協進會更為此召開執委會，集中討論如何革新教會，並建議在最短時間內召開一個全國的協商會議。<sup>129</sup>

1949年10月，全國協進會得悉中央人民政府將成立宗教事務委員會，不少委員便覺得基督教應成立一個全國的強而有力的行政機構，俾能與政府宗教機構取得聯繫。<sup>130</sup> 1950年1月底，全國協進會執委會議決在8月19至27日，在北京召開以「基督教與新時代」為主題的全國基督教會議，並組成專責籌備委員會以跟進有關工作。籌委會由朱友漁任主席，吳高梓任總幹事，並議決分成大會宣言、事工綱領、革新計劃及合作機構四組。<sup>131</sup> 由於教會改革是這次會議的重要焦點，負責擬定教會革

---

<sup>128</sup> 邢福增：〈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與發展（1949～1957）〉，邢福增、梁家麟合著：《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頁18～19。

<sup>129</sup> 〈協進會執委會重要決議〉，《天風》第186期（1949年19月29日），頁12。

<sup>130</sup> 〈教會應改組全國機構實證耶穌福音〉，《協進月刊》第八卷第三期（1949年11月），頁2。

<sup>131</sup> 〈全國基督教會議的籌備〉，《天風》第199期（1950年2月），頁12。

新計劃的重任，便落在革新計劃組的正、副組長趙紫宸與江長川（中華衛理公會會督）身上。<sup>132</sup>

不過，全國會議的召開卻面臨很多難題。4月，便傳出「因籌備工作未能於匆促間就序」而延期舉行的消息；<sup>133</sup> 到8月，協進會又表示全國會議與該會第十四屆年會相近，為了精簡節約，決定將會議拼入年會之中。顯然，在全國基督教會議的籌備過程中，教會既面對內部對革新的不同意見，復須承受來自政府方面對教會改革路向干涉的壓力。其中的關鍵即表現在中共對吳耀宗的革新主張的支持與護航。最後，在中共的影響下，協進會十四屆年會終於也宣告擁護吳氏的革新主張。中國教會如何革新以適應新時代的爭論，終於在強勢政治壓力下達成共識。<sup>134</sup>

趙紫宸在新中國成立後對教會改革的主張，大部分便是在1950年1月至7月間整理與發表的。只是，隨著全國會議的取消，他對教會革新的可能，也徹底失掉信心。

下文從四方面闡述趙紫宸在建國後對改革教會的構想。

### （一）改革的迫切——新形勢下的中國教會

在趙紫宸眼中，中國教會存在著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既有過去百多年來的積習，也有不少是在新的形勢中衍生出來的。他說：「今日中國的教會，能改革即能存，不能或不肯改革就得亡。教會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關頭，所以改革是必要的，決不可以避免的。」<sup>135</sup>

<sup>132</sup> 〈教會改革與基督教會議〉，《天風》第205期（1950年3月），頁12。

<sup>133</sup> 〈全國基督教會議延開〉，《天風》第209期（1950年4月），頁12。

<sup>134</sup> 詳參邢福增：〈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與發展〉，頁30～50。

<sup>135</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用愛心建立團契》，頁1。《用愛心建立團契》收輯了趙氏的三篇文章，除〈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外，尚有〈用愛心建立團契〉及〈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都是趙在1950年間撰寫的。第一及第三篇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以小冊子方式發刊，第二篇則刊於《真理與生命》，第十五卷第二期（1950年6月）。不過，《用愛心建立團契》的編者指出，重刊時在內容上「略有刪節」。因此，筆者除了〈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未見原稿，迫不得已繼續引用重刊稿外，其餘兩篇均以原稿為準，特此說明。



那麼，中國教會有哪些問題呢？這可分兩方面來看，首先是硬體部分，其次是軟體部分。在硬體方面，趙氏稱中國教會基本上是在一個「鋪張」的格局上發展的。所謂「鋪張」，是指整個傳教事業除了宣教牧養外，更包括教育、醫藥、文字、救濟等部分，「把宗教鋪張開來，弄得身體太大，心腦小，幾乎把基督教的中心作用忘記了。」這些不同的事業，原本的策略是作為傳教的工具，但是，結果「用工具的教會倒被削弱了」。因此，中國基督教最弱的部分是「教會本身」。<sup>136</sup> 在這個「鋪張」的格局上，中國教會復面對著各大小宗派間分裂的困擾。他認為，不同的宗派至今仍未能學習真正的合作，「傳統主義」成為宗派間學習合一的最大阻力。<sup>137</sup>

在軟體方面，趙氏強調，中國教會仍沒有真正的團契與屬靈生命，教會仍為人手短缺的問題所困擾。<sup>138</sup> 他特別針對教會的領袖階層，批評他們「三心兩意」，只顧自己的利益，在表面上提出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但骨子裡，「只是利益二字」。<sup>139</sup>

毋庸置疑，趙氏提出中國教會這些問題，基本上與他在四十年代時的論調一致。但是，他更關心的是，在舊時代裡人們或許並不太察覺問題的嚴重性，不過，在新時代裡，「這些東西都暴露出來了」。<sup>140</sup> 雖然新政府已確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是，他卻指出：

自由固然是上帝的恩賜；但亦是人們付了流汗流血的代價去爭取得來的。我們今日的信仰自由，是誰流汗流血去爭來的？我們流過一點汗，出過一滴血麼？所以我們要感謝上帝，更要痛下決心，在新中國的新政權新時代面前，表明我們配得信仰自由的理由。請想一想我們配得信仰自由的理由是甚麼，在哪裡？<sup>141</sup>

<sup>136</sup>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金陵神學誌》，第二十六卷第一、二期合刊：「金陵神學院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年11月），頁15。

<sup>137</sup> T. C.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3.

<sup>138</sup> T. C.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3.

<sup>139</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3。

<sup>140</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1。

<sup>141</sup> 趙紫宸：〈論信仰自由〉，頁1。

究竟趙氏所指的「配得」宗教自由，是甚麼意思呢？顯然，他已經覺察到中國教會處於一個新的時代之中，因此，教會必須藉此機會，革除種種的流弊，好讓自己能應付新形勢的挑戰；切切不要以為信仰自由有了保障，「工作依然可以率由舊章，就立刻睡著了！」<sup>142</sup>

那麼，新時代的挑戰是甚麼呢？首先，教會必須認識清楚，過去基督教藉著教育及其他服務事業來接觸中國社會的方法，勢將改變。就以教會教育為例，解放初期，中共的基本政策是，在教會學校內不應強迫學生信仰宗教及參加任何宗教儀式活動。<sup>143</sup> 因此，趙紫宸指出，新政府的教育政策，將要把教育與宗教「完全分開」，「中小學校裡不能再有宗教儀式與宗教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青年信徒便不能不「回到」教會裡找宗教生活問題的答案。長期與青年脫節的教牧，能夠應付這個挑戰嗎？<sup>144</sup>

此外，在新形勢下，趙氏認為基督教不得不「提掃除帝國主義嫌疑的問題」，<sup>145</sup> 具體而言，就是自養及自立的問題。這是一個長期困擾著中國教會的問題。要是教會繼續仰賴西方差會的供應，只會增加其倚賴感，妨礙達致自養的目標，也使她不能擺脫「外來的牽制」，這會成為中國教會自立的重大阻力！「教會一日不能自養，即一日不能自立，一日不能自立，即一日不能收改革的功效。」<sup>146</sup> 就以他十分關心的神學教育為例，趙氏毫不諱言：「（中國的神學院）所有的幾乎全是外款所支持的機構，而外款則有中斷的可能。」這是一個致命的打擊。<sup>147</sup>

再者，趙氏又指出，新中國社會所重視的集體主義，「要求一切人都有勞動的觀點，都有大眾的意識」，將明顯對教會的個人主義傾向帶

<sup>142</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20。

<sup>143</sup> 〈人民政府對教會學校的政策——華東教育部副部長沈體蘭先生對基督教學校校長的報告〉，《天風》第228期（1950年8月26日），頁9。

<sup>144</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20。

<sup>145</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2。

<sup>146</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24~25。

<sup>147</sup>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19。

來挑戰。<sup>148</sup> 不過，雖然面對新形勢的挑戰，但是，趙紫宸確信，「共產主義既是人對基督教的挑戰，也是上帝對意志薄弱的教會的審判。」<sup>149</sup> 與他一貫的思路相符，趙特別重視「人」在其中的影響力，故他認為，革新中國教會的關鍵，在於對教會內的人，特別是教會領袖的改革。因為，任何制度、神學或禮儀的改革，歸根究柢，都是涉及人的利益的問題。<sup>150</sup> 「改革教會就是要改造教會裡負責的人。要改造這些人的思想；要改造這些人的作風；要改造這些人的心腸。」<sup>151</sup> 所以，基督教會真正的敵人不在教外，她的將來也不是繫於外在的敵對力量，反倒是她對基督及福音的忠誠與否。<sup>152</sup>

## （二）改革的本質——基督教與帝國主義？

基督教在新中國面對最大的衝擊，毫無疑問源自她與帝國主義間的關係。對中共而言，帝國主義是新中國頭號的敵人。換言之，基督教的改革，便不能不觸及這個敏感的課題。周恩來在1950年5月對吳耀宗及趙紫宸等的談話，便清楚指陳了中共對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的看法。他說：「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槍炮的威力，強迫中國清朝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獲得傳教和其他特權的」；因此，中國教會今天面對的根本問題，在於中國人民認為基督教是洋教，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不可分割。在美帝國主義今天仍企圖利用中國的宗教團體來進行破壞新中國的活動的情況下，中國教會必須要堅持民族反帝的決心，「割斷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並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sup>153</sup> 他又清楚指

<sup>148</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3。

<sup>149</sup> T. C.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5.

<sup>150</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6~7。他又說：「一言以蔽之，改革教會，就必須改革我們自己的觀點，內心，與生活狀態。那是與我們的權利與習慣要發生利害的衝突的。」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3。

<sup>151</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3。

<sup>152</sup>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1067。另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27。

<sup>153</sup> 〈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220~222。

出：「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擴大，其界限要看是否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割斷了聯繫。」<sup>154</sup>

不過，趙紫宸對這個關於教會改革的本質問題——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卻顯然有著與中共不同的見解與詮釋。他說：

人們懷疑中國的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有甚麼勾結；他們看見西方的基督教有政治、經濟、種族種種關係，又看見中國的基督教是西方傳來的，自然會聯想到中國的基督教與西方的基督教在政治、經濟等等問題上一鼻孔出氣。其實呢，中國的基督教沒有這樣壞。教會裡與美國教士接近的，多少受了美國教士的影響，有點偏向美國；與英國教士接近的，也多少受了英國教士的影響，有點偏向英國。……這原是人情之常。教士中間不少真心愛人的男女；他們真感動人，也真叫人愛他們。因為愛他們，也就對於他們的國家與人民發生了好感。……<sup>155</sup>

那麼，為甚麼基督教現在又會被視為人民的鴉片呢？趙氏認為，問題的關鍵，確實在於基督教教會內部的錯誤與罪惡，這一部分應歸咎於西方基督教教會的罪惡，一部分出於中國信徒的愚昧、迷信、依賴、自私與狂妄。總而言之，這是教會、信徒及其領袖的偏向的結果，而不是基督教本身的問題。<sup>156</sup>換言之，人們沒有看見基督教本身的價值，卻看見了基督教所穿的不三不四的衣服。「我們做基督徒的只能責備自己，不能錯怪他人；因為這個外表是我們造的。」<sup>157</sup>

這樣看來，趙氏承認基督教有「帝國主義的色彩」，但卻否認這是基督教的本質。他認為，與其從本質的角度來看問題，倒不如從現實歷史的過程中，找出導致問題的所以然，來得更有意義。所以，他說：「不過西宣教師藉著帝國主義勢力，作威作福的事情少，中國教徒仗勢

<sup>154</sup> 〈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頁225。

<sup>155</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16。

<sup>156</sup> 趙紫宸：〈本刊的話〉，《真理與生命》第十五卷第一期（1950年3月），頁1。

<sup>157</sup> 趙紫宸：〈本刊的話〉，頁2。他又說：「抗議教的改革本來是反對迷信的，本來不是人民的鴉片，本來是鼓勵理性與科學而竟得了相反的結果。這真是歷史上對於人生的一個大諷刺。」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3。

欺人，瞞著西教師去作惡的成分多。教會裡的中國牧師教友都自動地仰承西宣教師的鼻息，造成了買辦的作風。這一大半是中國人的不好。」只要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教會「退居了客位，不再有任用人員的權柄」，肅清這種「借來的帝國主義的成分」的問題，便解決了一大半。<sup>158</sup>

在解決中國教會自養的問題上，趙氏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強調，自養就是「不靠洋錢」。憑良心說，這些金錢都是西方信徒愛心的捐助，表示他們對中國教會的關懷。「在宗教的國際友誼上看來，似乎並無理由去懷疑牠〔他們〕有甚麼不良的動機與作用。」但是，美金一旦來了，人便受不住誘惑。<sup>159</sup> 在周恩來與吳、趙等人的談話內容中，也特別針對自養的問題。周氏認為，作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不向別人低頭，不依賴別人。」但是，「我們也不盲目排外」，「對於每一筆外款，要加以辨別，如果是有附帶條件的援助，就不能接受。」<sup>160</sup> 這裡，反映出中共也確切明白到，在短期內立即實現自養，是完全不符合現實的。對此，趙紫宸也充分理解，但是，他似乎更明白，終有一天，外援是會停止的。因此，「從現在起，我們要問一問，美金若不來，我們為教會的生存負責的人要教會怎樣辦？」<sup>161</sup>

趙紫宸既然否認了傳教事業與帝國主義侵華的密切關係，故他認為中國教會改革的本質，便是宗教而非政治上的問題了。事實上，沒有人會否認自治、自養及自傳不是中國教會革新的目的，但是該從哪一個角度來理解「三自」，方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當時受到中共大力扶持的吳耀宗，他對教會革新問題的態度，便較接近中共官方的理解了。吳耀宗指出，早在二十年代，中國教會在推動「本色教會」運動方面，便以自治、自養、自傳為目標。但是，他再三強調，現在他所倡導的革新運動，雖然在「意義上」與解放前的努力是一致的，但是「在內容和本質上」，革新運動卻與解放前的本色教會運動迥異。因為，「解放前的中

<sup>158</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16。

<sup>159</sup>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9。

<sup>160</sup> 〈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頁223。

<sup>161</sup>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9~10。

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教會的改革，「都是在這個社會意識形態下發動的，也沒有超過這個意識形態的範圍。」現在的基督教革新運動，卻是在「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以後的新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朝著社會主義道路邁進的中國」的新環境下發動的。<sup>162</sup> 這是對「三自」的政治化詮釋。

趙紫宸顯然更多地從宗教的含義，來理解教會革新與「三自」原則的關係。他關心的，毋寧是自治、自養及自傳的原始（宗教）意思，而不是從帝國主義與傳教事業結合的前設來看「三自」。因此，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撇除基督教一同傳來的西洋文化遺傳的附屬品」，<sup>163</sup> 只要「放下基督教從西方帶來的包袱，捉住基督教原來所有的真實」，問題便容易解決了。<sup>164</sup> 而他對「反帝」的理解，也「不是反善良的國際友人，乃是反罪惡」，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行為而已。<sup>165</sup>

也許正因著趙氏從純粹宗教的含義來理解「三自」，因此，他對那些與西方差會沒有聯繫的本土自立教會，便顯得格外肯定了。他指出，「在今日各種艱難狀況中，教會處處正在興起來。耶穌家庭、小群，各種靈恩派正在各地生長，像雨後的春筍一樣。」<sup>166</sup> 相對這些完全自立的教派，眾多依賴外款的大宗派教會，「靈力感力極薄弱，而自養亦萬分困難」了。不過，他同時亦對小群、靈恩會等「還要主張自己是真教會，別的基督教組織是魔鬼的團結」的狹隘神學主張，表達了他的不滿。<sup>167</sup> 還得指出，在解放初期確有不少言論，對這些本土自立教派，特

---

<sup>162</sup>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羅冠宗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獻（1950~1992）》（上海：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93），頁6。

<sup>163</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16。

<sup>164</sup> 趙紫宸：〈本刊的話〉，頁2。

<sup>165</sup>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20。

<sup>166</sup>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7。

<sup>167</sup>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20。

別是耶穌家庭表示欣賞及肯定。<sup>168</sup> 燕大宗教學院的學生，曾拜訪耶穌家庭在山東馬莊的老家及泰安濟南的幾個小家，回來後更到各教會報告，「增加不少教會改革的力量」，<sup>169</sup> 甚至發出「向耶穌家庭學習」的呼籲。<sup>170</sup>

### （三）改革的原則——用愛心建立團契

由於趙紫宸認為改革教會的本質是純粹的宗教問題，因此，他尋索革新的原則及重心，也是從宗教的立場作出發點。他指出，馬丁路德改教的根本原則是「因信稱義」，今天中國教會改革的根本原則就是「用愛心建立團契」。<sup>171</sup>

趙氏認為，路德改教無疑有著重大的貢獻，但最大的問題，在於「偏倚自由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傾向在新中國顯然是不合適的。他說：「我們應當注重深一層的，教會本質方面的建設。我們所提出的不是自由個人主義方面的，乃是社會大眾方面的」；「這不是放棄因信稱義的道理，乃是糾正自由個人主義的偏差，乃是轉移改革的重心，而強調基督的身體的真正現實。」<sup>172</sup> 用愛心建立團契的改革原則，正是針對中國教會的問題，從而建立一個共同改革教會的意識，一個能夠收拾一盤散沙的愛的團契，一個民主的、大眾的、自立、自傳、統一的教會。<sup>173</sup>

用愛心建立團契的主張，基本上是承繼著趙氏在四十年代的教會論而來的。現在，趙氏進一步指出：教會就是一個愛的團契，要建立教會，就是要用愛心來建立團契。他這樣描繪：

---

<sup>168</sup> 這相信與耶穌家庭的共產制度有關，參汪錫鵬：〈耶穌家庭的共產制度〉，《基督教叢刊》第二十四期（1950年3月），頁39～49。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很值得進一步探討。

<sup>169</sup> 劉清芬：〈燕大基督教團契一年總結報告〉，《恩友團契月刊》第二卷第六期（1950年6月），頁14。

<sup>170</sup> 〈向耶穌家庭學習〉，《恩友團契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50年4月），頁1～2。另邱斌：〈向耶穌學習、向耶穌家庭看齊〉，《恩友團契月刊》第二卷第六期，頁17。

<sup>171</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10。

<sup>172</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11～12。

<sup>173</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25～26。

在基督的身體，教會，之內，一個人窮，大家援助他使他勝過窮，一個人病，大家看顧他使他得到健康。最小的弟兄受最親密的關心；最弱的姊妹，得最熱切的扶持。聖徒是一家的，有共同的憂患有共享的安慰，在這相共的愛裡，人人感覺到上帝的臨在，聖靈的感動。教會於是乎成了上帝真實的憑藉，福音有力的見證。<sup>174</sup>

可是，於現在中國的情況下，根本找不到這樣的教會，根本沒有一個真正在愛裡的團契。有的只是「這種或那種舶來的制度，這種或那種移植的遺傳」。在這裡，趙氏突顯出愛的團契與制度、遺傳間的因果關係。他認為，制度、遺傳應當是增進團契的工具，要是任何制度、遺傳做了愛的團契的障礙，「這些就成了要不得的東西，就應當被毀棄或被改革。」相反，設若愛的團契建立起來，就「不難有制度與遺傳」。他說：

所以我們應當主張在改革教會的工作程序中第一是用愛心建立團契。有了愛心所建的團契，一切都可以有；沒有愛心所建的團契，一切是妄作妄為，毫無意義的。<sup>175</sup>

換言之，一個真正的愛裡的團契，乃教會改革的唯一基礎，也是教會得以革新的重要保證，「是一切教會問題的總解答」。<sup>176</sup>

就以自養為例，趙紫宸認為，真正解決中國教會的自養問題，在於教會內所有信徒均有上帝所澆灌的「聖愛」。假設有一個教堂內有一百個教友，一個牧師；又假設每一個教友都愛牧師，人人彼此相愛，牧師又愛人人；「難道這一百個人，雖然窮困，不會去供養牧師一家麼？難道牧師一家還不甘心克苦服勞而要求過分的報酬麼？」這樣，愛的團契不就解決了自立自養的問題了麼？再進一步言之，教會也可以真箇合一了！<sup>177</sup>

<sup>174</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2。

<sup>175</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2。

<sup>176</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15。

<sup>177</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15。



職是之故，趙氏反對任何操之過急的革新方案，因為用愛心建立團契是一件宗教及道德的事，須有「聖靈的感導」及「修養的準備」，這些均是不容性急的事，<sup>178</sup> 否則，就會「倒浴湯把新生的嬰兒也倒在陰溝裡去」。相反，只要能有所計劃地、有步驟地去做，<sup>179</sup> 「一切應興的就自然而然地興了，應革的就自然而然地革了」。<sup>180</sup>

這裡清楚看見，作為全國基督教會議革新計劃組組長的趙紫宸，在教會改革的問題上，與同組的江長川之間，已呈現了一定的分歧。江氏從「本色教會」的理念出發，把改革教會的重點，更多地放在制度及組織之上。<sup>181</sup> 而當時另一位熱心革新教會的吳耀宗，對教會改造的主張，無論從本質與內容上，也與趙氏迥異，前者是政治性的，而後者則是宗教性的。歸根究柢，趙紫宸關心的，是能否用愛心建立團契的問題，所以他說：「人若不去作這樣的事，而直接去改革教會，所作的終必歸於徒然。」<sup>182</sup>

#### （四）改革的目標——共產政權下的基督教

毋庸置疑，用愛心建立團契這個改革教會的根本原則，最終目標就是尋索基督教在新社會下的獨特貢獻。基於趙紫宸一向對教會與社會的關係的重視，他在解放後仍然深信，「教會應該了解到不論在甚麼政權

<sup>178</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12。

<sup>179</sup> 趙紫宸：〈為一個真的中國教會奮鬥〉，《天風》第226期（1950年8月12日），頁1。

<sup>180</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12。

<sup>181</sup> 江長川：〈中國基督教會的革新芻議〉，《協進月刊》第八卷第十期（1950年6月），頁2~5。例如，在制度方面，江長川關懷的是未來教會的行政應否保留執事、長老與會督（主教）的三級制，或是去會督而行兩級制，抑或由平信徒負責證道、管理與教導的新制？（頁2）對此，趙紫宸的意見是：這（指討論三級制兩級制）是一種「無聊的，永遠使人分裂的問題」，「為甚麼必須是三級制兩級制而不是七級制八級制呢？」歸根究柢，這是離開了問題的中心來討論問題，「沒有愛的團契，改革制度是無用的，而且幾乎是不可能的。」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5~6。

<sup>182</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12。

下，也有她要履行的社會責任」，<sup>183</sup> 中國教會必須肩負基督福音在新社會下的「創造性見證」(creative witness)。<sup>184</sup>

在新形勢下，趙氏仍然思想到中國教會如何「作中國社會中的教會」，簡言之，就是怎樣作不與社會脫節的教會的問題。他指出，由於新政府計劃提高人民的文化水準，所以各宗派教會必須聯合起來，在實際服務人民的事工上，一致彰顯基督的精神。「我們聯合著可以發揮很大的力量，可以幫助掃除文盲，設立業餘學校，辦托兒所，作救濟救荒的工作等等；也可以參加生產，添設技術訓練，職業訓練的學習班等等。」<sup>185</sup> 我們得留意，這裡趙氏所指的，並不是要求教會繼續維持，甚至擴展其在教育及社會服務上的工作，這既與他的主張相違反，也與他對新時代的認識迥異。

趙紫宸在這裡所建議的，其實是指教會對外，作為一個實際服務的中心，或稱「基督教服務所」。這個服務所，在禮拜一至禮拜六的時候，只專注於服務，「不作宗教的儀式」，因為，教會已「不可用服務來換取人家對於基督教的歸信」了。但雖如此，通過實際的服務，每一個契友仍可在事工上「磨礪他的信仰行為」及「增進團契的意識，加增契友彼此間的友愛」，這已是團契生活的一部分。<sup>186</sup> 在中國教會今天需要用「行為證道」，而不是「侃侃而談，牽文帶武講道」的時候，這種實踐更是不可或缺的。<sup>187</sup> 他說：

我們不必與人辯論基督教是不是唯心論，是不是唯物論，因為基督教是實行，是生活，不是這個論，那個論。我們不必，也不當爭得面紅耳熱，證實基督教不是鴉片，不是迷信，不是溫情主義，不是自由個人主義，不是科學昌盛之後必然無存的人類的靠傍。不，這不是我們說話的時候；這是

<sup>183</sup> T. C.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4.

<sup>184</sup>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1066.

<sup>185</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7。

<sup>186</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10。

<sup>187</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3。

用實行證道的時候。若沒有行為，沒有成績，沒有於人群社會有益的實際工作，多說多話，適足以表明我們無恥的空虛。<sup>188</sup>

基督徒必須履行公民的責任，參與社會，服務人群，這是當時不少教會人士的共識，於趙氏也沒有例外。但是，趙紫宸卻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論基督徒如何盡力服務，「也不過是盡了人民的責任，不見得有甚麼特別與人不同的地方。」<sup>189</sup> 歸根究柢，趙氏又回到一直縈繞在他心底的問題：基督教對社會可以提供甚麼獨特的貢獻？為了更完備地解答這個問題，趙紫宸乃展開了他對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進一步反省及整合。<sup>190</sup>

在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問題上，趙氏主張與新思潮協調，建立一套社會主義的神學。他認為「真正的新思想是有革命性、歷史性的，要求著人民大眾的利益，要求著無產階級社會的實現。」在這方面，基督教的本質是與共產主義相同的。因此，「中國的神學要在世界觀、歷史觀裡強調這些思想的成分。」<sup>191</sup> 但是，他另一方面又堅持基督教的優越性。「我們不必強求調和，必得獨立的，我們應當保存其獨立。」<sup>192</sup> 趙氏所指的獨立，可從本質、歷史觀及倫理觀三方面說明。在本質上，基督教是一種以耶穌基督為歸依的信仰生活，而不是一種哲學。雖然，在不同的時代裡，基督教均會借助當代最有力的思想為自己解釋，但是這並不是信仰生活的本身，更不能概括永恆無限及超越的上帝。<sup>193</sup> 在歷史

<sup>188</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3。

<sup>189</sup> 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4。

<sup>190</sup> 他說：「我們生在這個時代，若不接受這個時代最前線的思想，我們就是落伍的；若不能為基督教本身在理論上，生活上作一點最前線的見證，我們就算是不負責任的。我們所信的基督教若有內在的真實，若有自身的確實性，那末我們可以全心地接受時代中的思想，並且可以在時代的方式裡，將這真實、將這確實表達出來。」趙紫宸：〈本刊的話〉，頁3。

<sup>191</sup>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17。

<sup>192</sup>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17。

<sup>193</sup> 趙紫宸：〈本刊的話〉，頁1。另清芬、紫明、宗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冬令學習會記要〉，《恩友團契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50年2月），頁6。是次冬令會，由燕大宗教學院主辦，邀請了平津各教會青年工作人員及各大學的基督徒團契領袖參加，目的是「加強信仰生活，學習新思想，研究當前教會問題」。舉辦日期為1950年2月4至9日，在燕大舉行。參〈北京青年基督徒學習會〉，《天風》第197期（1950年1月21日），頁12。從

觀方面，基督教與唯物論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確信在歷史的過程中，人類永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把天國實現。在倫理觀方面，基督教則再三強調其根基乃建於上帝在基督裡向世人說話，並要求人的絕對忠誠的基礎上，也指陳人類因著罪惡，只有通過基督方能得救的事實。<sup>194</sup>

職是之故，趙紫宸重申，雖然「基督徒所當行的，共產黨人倒實行了」，但是，「牠（指共產主義）所欠的就是不信上帝」，所以，我們仍得強調基督教對文化的使命，不在乎廢棄，乃在乎成全，基督教可以成全共產中國的社會使命。<sup>195</sup>

那麼，基督教又如何獨特地成全共產中國的文化呢？在北平解放初，趙紫宸嘗言：「在現在及未來數年間，共產主義仍將充滿激情與自信。但是在這個變幻的世界裡，浪漫轉瞬即逝，人類罪性與自私的事實，伴隨著對屬靈救贖與耶穌基督的渴求，將擺在那些曾經熱心者的眼前。時候將到，也許就在不遠的日子裡，那時，不少共產主義者為了得到拯救，將叩敲教會的大門。」<sup>196</sup>顯然，趙氏確信，共產主義解決不了人的罪性及自私的問題，惟有基督教方能提供完備的救法。

當趙氏真箇開始在共產政權下生活後，他對於教會以外沒救法的信念，仍然沒有動搖。<sup>197</sup>因為，他對改革教會以回應新時勢仍有些期望，也確切在努力推動其「用愛心建立團契」的改革理想。但是，到1950年7

---

劉清芬等三人的記要可見，基督教與馬列主義的認識，是學習的重點。而有關的內容，顯然也是出於趙紫宸的論點。

<sup>194</sup> 另清芬、紫明、宗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冬令學習會記要〉，頁6。

<sup>195</sup>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7、9~10。

<sup>196</sup> T. C.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5.

<sup>197</sup> 「最要緊的，對於社會國家貢獻最大的，是信徒們道德生活上嚴格的紀律。我們知道人不可以完全遏制情慾，因為遏制情慾是造成不正常的人格。我們也知道人也可以不控制情慾，使其得到適當的滿足而不使人作情慾的奴隸……在用愛心所建的團契裡，信徒們必要互相勉勵，以道義相尚，以風節相高，而為人生建立道德的根基。謙卑誠實清潔廉正是不自私的人格保證，是愛的團契的靈魂。這些德性，沒有宗教是難以成立的，是不能實現的。所以真誠清潔的聖愛是基督教永遠光明的見證。」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頁11。

月間，當他發現在推動改革運動上，遇上了強大的政治干擾時，<sup>198</sup> 他感到十分絕望。似乎，他隱若感受到教會將面對一次更大的衝擊。對於教會在新中國的位置，他說：

在今日中國的社會裡，我們好像不能發生甚麼作用，既不能在制度的改革上發生效率，復不能在流行思想上引起變化。中國的社會好像再也用不著我們與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了。勞動生產是大家的事情，沒有教會，在這些事情上也損不了一根毫毛。社會服務是暫時的，將來政府所領導的組織都能去幹辦；教會若立刻倒塌了，國家在表面上也見不到甚麼虧闕。但是我們知道時候要到，人人豐衣足食，諸慾俱達，人必要問人生活著是為甚麼的，人的價值，意義，歸宿是甚麼，人有沒有真實性，世界有沒有歸宿，真理以甚麼為標準，道德以甚麼為根基。豐衣足食，知識滿溢之人，必要經驗到自我的孤單，人生的空虛。那時候，我們方才有機會揭開我們的瓦器，將寶貝彰顯出來。我們今日的責任是堅守，是保全，是潛伏著的發展。<sup>199</sup>

為甚麼教會的責任變成「堅守」與「保全」呢？一方面，這是因為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缺乏悠久的歷史文化基礎，而且信徒數目又極少，根本不能與蘇聯及東歐等共產國家宗教極盛的情況相比；<sup>200</sup> 另一方面，他似乎覺察到教會的改革，正在面對極大的阻力，並且隨著時勢的變化，將失了重心，一些原先計劃改革的課題，將隨著客觀形勢的衝擊，而成為事實：

我們不必大講教會的改革了。西國宣教師快要走完了，美金英磅快要停止供給了，與普世教會的聯絡也快要減至最低限度了；教會還有甚麼地方可以改革呢？教會不能再被懷疑是帝國主義可以利用的工具了，我們就不必著急去消除從帝國主義而來的毒素。教會的典制，遺傳，神學，教義，也沒有可以改革的，且也不是提倡改革就不以變更的。不自養只有滅亡，不

---

<sup>198</sup> 筆者相信，這時趙氏已清楚見到，中共對吳耀宗的革新運動的全力支持，將最終主導中國教會改革的路向，因而在態度上表現出極大的無奈。

<sup>199</sup> 趙紫宸：〈寶貝放在瓦器裡〉，《真理與生命》第十五卷第三期（1950年9月），頁9。

<sup>200</sup>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23～24。

合一只有軟弱；事勢所至，教會必走上上帝所指示的道路；我們還有甚麼教會改革的事可以提倡呢？<sup>201</sup>

面對形勢的變化，趙氏深切感受到，教會存在的基礎勢將受到嚴重的威脅，信徒也將承受鬥爭與衝擊，故他說：「教會不是要改革；教會乃是要得一個新的建立。上帝的愛要教會成為愛的團契。所以在上帝的審判之下，我們所當提倡的教會改革就是教會領袖信徒們革面洗心的重生，也就是教會整體的重生。」因為，趙紫宸指出，教會的人數將會「減之又減」，教會的工作也將「損之又損」，所以，基督徒要作好準備，「要快樂地在少數人中作少數人，就是在全體信眾之中作完全負責的聖徒；要靜默地接受思想上的鬥爭，與鬥爭可能帶來的譏諷、蔑視與欺侮。」幾年之內，在新中國成長，接受新教育的中國人，便不會完全了解基督教了，基督徒也將要擔負更多的苦難。但是趙氏也作出提醒及勸勉：無論環境如何，「我們卻負著上帝加在我〔們〕身上的偉大而光榮的使命」。<sup>202</sup>

這個使命是甚麼？就是在人覺得「沒有意義，沒有真實，沒有價值，沒有標準，沒有根基，沒有歸宿」，並期望尋求生命的出路與安頓時，「我們可以打開瓦器來將他們所需求的白白的貢獻給他們」。<sup>203</sup> 因為，教會的意義是「心靈的家庭」，<sup>204</sup> 這是人們期望找到的「真理的標準，道德的根基，價值的保障，自我的實在，人生的意義，心靈的歸託」，也是「政權與科學所不能供給的」寶貝。<sup>205</sup> 在中國各地的教會裡，都將保存著「我們」與「我們的瓦器」，成為「千千萬萬的小火焰」。也許這是「歷史所看不起，社會所不注意的，不信的人所以為到時必滅的」，但是，將來卻要成為「我中國人民心靈的榮光」。<sup>206</sup>

<sup>201</sup>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24。

<sup>202</sup>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24～25。

<sup>203</sup>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25。

<sup>204</sup>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2。

<sup>205</sup>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21。

<sup>206</sup> 趙紫宸：〈寶貝放在瓦器裡〉，頁9。

必須指出，此時趙氏的心情是極之沉重的。在7月11日的一篇文章裡，他形容自己現在是「事情多，心情劣」，「心勞力薄，人生草草」。<sup>207</sup> 及至7月26日寫畢《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後，趙氏又在後記裡指出：「現在是七月將終的時候，籌備委員會早已議決不舉行全國大會，最近該會又自行解散，連擴大的籌備會議都不要舉行了。」特別的是，趙氏指出，「這些變化當然是依我們對於時勢的了解而發生的」。顯然，趙氏已經清楚當前局勢的發展，特別是中共全力支持吳耀宗革新教會這事實。事情既然發展至這個地步，對於改革中國教會的構想，趙氏也流露出心灰意冷，他說：「大概話已說盡，此後我不必再寫關於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理論文字了。心勞力拙，憂思忡忡，從今以後，必須束身隨主，服從上帝的聖命，以終我的餘年。」<sup>208</sup>

## 五、結論

總的來說，趙紫宸的教會改革思想，可以借用儒家「內聖外王」的觀念來進一步說明。打從二十年代以後，趙氏即是一位徹底的人格救國主義者。他認定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最主要的任務與使命，在於其作為社會重建的文化基礎。換言之，救國的「外王」，乃仰賴於基督教信仰的「內聖」，後者是開出前者的充分保證與唯一基礎。即使趙氏在三十年代中開始逐漸轉向認同新正統主義神學，也沒有改變他這個基本的信念。正如筆者在前文指出，他在四十年代後，無疑更著重教會的本質意義，但是，這個「體」仍具有成全社會文化的「用」的價值。可以說，道成肉身的「內聖」，仍然是成全文化的「外王」的依據與保證。職是之故，趙紫宸確信，教會在中國社會之中，具有其獨特的任務與使命。

新中國建立後，由於共產黨在成就「外王」的事工（救國）上，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故趙氏也改變了抗拒共產主義的態度。他不僅承認新

<sup>207</sup> 原本金陵神學院邀約趙氏寫一篇關於四十年來的中國神學的文章，但是趙紫宸表示「因事情多，心情劣，沒有工夫從事於歷史的檢閱」，故此仍沿用「四十年」三個字，但是卻將重點從「回顧」變成「前瞻」。參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14。

<sup>208</sup>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27。

政權是合法的，更積極參與其中。儘管如此，本著一貫在教會論方面的立場，他仍然相信，無論新中國取得怎樣的成就，她始終不是一個完善的國家，社會與文化仍有其缺漏的地方，有待基督教的成全與補充。故基督教是超越一切政權之上，成為所有歷史文化的審判者與成全者的。就這個角度而言，「內聖」仍可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成就不同的文化（包括共產主義），開出「新外王」。

筆者相信，趙紫宸與吳耀宗在解放前後對教會改革的不同取向，事實上正源於他們對新中國這「外王」的不同立場。對吳耀宗而言，由於他在三十年代後期開始，已經認定社會主義乃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故他也不得不接受社會主義對宗教及基督教現況的批判，並以之為改造基督教的基礎。他指出，基督教雖然有永恆的真理，但是，「這個真理並沒有被現在有組織的基督教表現出來，這是基督教的弱點。」不過，他卻認定，「基督教以外的人，也未嘗沒有這些道理。他們是憑著經驗，一點一點學習得來的。」<sup>209</sup> 他在這裡所指的「基督教以外的人」，自然是指共產黨了。事實擺在眼前，吳氏確信共產黨比現存的基督教，更能把永恆的真理體現出來，它也是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因此，吳耀宗提醒基督徒：新中國的成立，事實上意味著基督教「已經不是醫治世界痛苦的萬靈藥的專賣者」，相反地，「上帝已經把人類得救的鑰匙，從它的手中套去，給了別人。」所以基督教必須「大徹大悟，讓舊的軀殼死去，讓新的生命來臨」。<sup>210</sup> 惟有這樣，才能「恢復了耶穌福音本來的面貌，使基督教變成新中國建設中一個積極的力量」。<sup>211</sup>

吳耀宗可以說是無條件地向社會主義效忠的，甚至他對基督教的忠誠，也是服從於對「祖國」的忠誠之下。<sup>212</sup> 在救亡的心態下，吳氏顯然

---

<sup>209</sup> 這是吳耀宗在1950年1月底在基督教協進會擴大執行委員會上的演講，參何慈洪筆記：〈基督教與新時代〉，《基督教叢刊》第二十四期（1950年3月），頁69。

<sup>210</sup> 吳耀宗：〈基督教的改造〉，《田家》第十六卷第三期（1949年9月），頁12。

<sup>211</sup> 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頁6。

<sup>212</sup> 解放初期，丁光訓曾問吳耀宗：「新中國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政府要取消宗教，你是否還擁護新中國？」當時吳認為丁過於聽信了國外所謂解放區迫害宗教的謠言。他說：「退一萬步來說，只要祖國是美好的，那麼，即便宗教受到打擊，我還是愛祖國。」



是一個徹底「反傳統」的人，並且當他目睹基督教的種種問題，無法成就救國的「外王」時，他更確信基督教的傳統也須徹底予以打破。「全盤性的反傳統」使吳氏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真空」，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正好滿足了「外王」的需要，並填補了這個真空。<sup>213</sup> 及至新中國成立，更意味著他的選擇是正確無誤的，這個烏托邦的理想也有了充分實踐的可能，實現理想的中國新社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改造下，是遲早之事。這是吳耀宗真箇絕對信奉社會主義，甚或視之為某種政治宗教來皈依，<sup>214</sup> 並把基督教也服從於這個「真理」的審判之下的重要原因。

相反，對趙紫宸來說，儘管同樣對現存的教會有許多不滿，但是，他卻深受巴思 (K. Barth) 思想的影響，認定批評教會，就是批判自己，因為他也是教會的一分子。因此，趙氏堅持，無論如何，「教會之外是沒有救法的」。<sup>215</sup> 由於他對教會的理解，特別在四十年代以後，是從基督教成肉身的本體這角度入手，故他仍然持守耶穌基督絕對的人格，也認定這是建立基督身體（教會），成就「新人」，成全中國文化以救世的不二法門。換言之，趙紫宸從來沒有放棄作為「內聖」之學的基督教信仰，反倒對基督的特殊救贖的認信，使他愈加確認「內聖」之學的絕對意義與終極價值。總之，不管「外王」的具體內容與要求是甚麼，「內聖」仍是成就與開出「外王」的充分保證。與吳耀宗不同，趙紫宸

丁光訓：〈先進的吳先生〉，《回憶吳耀宗先生》，頁92。

<sup>213</sup> 在此，筆者借用了林毓生對「全盤性反傳統」及「意識形態的真空」的概念，來解讀吳耀宗的思想。參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馬列主義及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新史學》第六卷第三期（1995年9月），頁132~134。林氏指出，中國許多激進的知識分子之所以信服與接受中式馬列主義，主要是因為如此激烈的反傳統主義造成了「意識形態的真空」，他們處在這樣的危機中，在心理上與思辯邏輯上，急迫地尋求對未來能提供確定的系統性政治導向與能對目前的一切問題提供整體性解答的——強勢意識形態。中式馬列主義滿足了他們這個需要。換言之，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所造成的「意識形態的真空」，為中國知識分子及接受中式馬列主義者提供了結構的可能（頁139~140）。

<sup>214</sup> 楊慶堃也指出：不少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效忠，乃是在傳統解體後，以共產主義作為新政治宗教的代入。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378-86.

<sup>215</sup>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1。

在追求救國的歷程中，並沒有出現「意識形態的真空」，因道成肉身的基督已是他的思想核心所在；故他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接受，主要是基於承認既成事實的考慮。抑有進者，趙氏的教會論也讓他認定，即使新中國已完成了「解放」的「外王」，但肯定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如此，基督教信仰的「內聖」，便仍然可以本著其先知的角色，發揮「社會中的社會，文化中的文化」的功能，成全新中國的文化，開出「新外王」。

職是之故，趙紫宸在新中國成立後，提出「用愛心建立團契」的改革教會原則，強調教會必須正本清源，復振「內聖」之學，方能重尋其在新社會中的角色。然而，教會存在的種種問題，特別是新中國將面對的挑戰，教趙氏不得不承認，開出「新外王」的先決條件，取決於「內聖」之學能否徹底復興。

不過，隨著黨國力量滲入教會的革新運動，特別是吳耀宗成為中共欽點的教會革新推動者後，趙紫宸便愈加覺察到，教會將難免受到更多來自政治方面的衝擊。但是，當時無論是對吳耀宗或支持他的中共而言，中國教會首要的改革在於「潔淨」教會，把教會中帝國主義的毒素與影響徹底清洗掉。誠如駱振芳所言：「提出『愛心建立團契』的主張不能解決中國教會的主要問題。我們體會到三自愛國運動，正像耶穌潔淨聖殿一樣，是潔淨教會的運動。首先教會需要潔淨脫離一切污染，然後才談得到用愛心建立團契。」<sup>216</sup> 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反帝愛國」為任務的三自革新成為基督教在共產政權下存活的首要條件，趙氏不得不暫時放低他對開出「新外王」的理想與使命，轉而呼籲保住「內聖」之學，免其有失。他說：「我們今日的責任是堅守，是保全，是潛伏著的發展」，<sup>217</sup> 這是他以放在瓦器裡的「寶貝」來形容教會之角色的原因。

大抵是出於「保全」基督教的考慮，在吳耀宗發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時，趙紫宸便成為宣言的發起人之

<sup>216</sup> 駱振芳：〈懷念趙紫宸先生〉，頁26。

<sup>217</sup> 趙紫宸：〈寶貝放在瓦器裡〉，頁9。

一。<sup>218</sup> 當他要以身作則，表態呼籲更多信徒簽名響應時，也不得不強調中國基督徒必須「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場上反對帝國主義」，表明他們是愛國，並且是「全心擁護政府」的立場。<sup>219</sup> 在抗美援朝運動上，趙氏也積極參與。<sup>220</sup> 這些政治上的表態，成為趙氏表白自己愛國的具體行動。

趙紫宸這個揚棄「外王」而保存「內聖」之學的企圖，在急風驟雨的政治運動之下，顯然是無法實現的。隨著「全能政治」對社會各領域的入侵，黨國以「反帝愛國」作為動員社會一切力量的總原則時，作為社會成員之一的教會，也難以在這個政治任務上開脫過去。<sup>221</sup>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當黨國將處理基督教問題定性為反對美帝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鬥爭，並要求教會領袖人物以控訴運動的方式來揭穿美帝的陰謀時，趙紫宸也不得不在1951年4月的北京會議上，投入控訴的行列之中。他所控訴的對象，就是與他有密切關係的美帝分子司徒雷登及普世基督教協進會。<sup>222</sup> 為了劃清界線，趙氏更同時宣布辭去普世協進會主席一職。<sup>223</sup>

1952年，中共發起「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雖然這個運動主要是針對政府機關中變質的幹部，但是，在整體的「反帝愛國」的形勢下，基督教也難以倖免。燕京大學在第一階段的

---

<sup>218</sup> 〈文件發起人致全國同道書〉，《天風》第233至234期（1950年9月30日），頁3。

<sup>219</sup> 趙紫宸：〈論中國基督教界所發表的宣言〉，新華時報叢刊社編：《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北京：新華書店，1950），頁8。

<sup>220</sup> 趙紫宸：〈基督徒要抗美援朝〉，《天風》第246期（1950年12月30日），頁1；另〈基督教界抗美援朝的決心〉，《真理與生命》第十六卷第一期（1951年3月），頁11～14。

<sup>221</sup> 關於全能政治的發展對中國教會的制約，參邢福增：〈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與發展〉。

<sup>222</sup> 他最後說：「我今天把心裡的事情向諸位同志同道完全傾倒出來，諸位給我這裡控訴的機會，使我的靈魂得了一番洗刷，我是衷心感謝的。」詳參趙氏的控訴文章，趙紫宸：〈控訴司徒雷登並世界教會協進會〉，《恩友》第三卷第六期（1951年6月），頁2～5。

<sup>223</sup> 趙紫宸：〈我辭去了世界教會協進會主席之職！〉，《協進》新一卷二期（1951年7月），頁10。

「反浪費」後，便進入了「肅清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影響」的第二階段。經過全校百多位老師的自我檢討後，運動便進入全校控訴的第三階段。3月，作為宗教學院的院長，趙紫宸先後受到兩次全校的控訴，著令他進行徹底的自我檢討。不過，有關方面似乎對趙一方面承認對美帝唯命是從，但另一方面卻又以自己是「左傾宗教家居功」及一向同情革命的檢討，非常不滿，並指他犯了對抗美援朝運動採取「消極抵抗不作捐獻等嚴重不愛國行動」之罪。最後，由於他被認為態度「頑固」，終於在3月10日召開的第三次大會上，由「節約檢查委員會」以「利用宗教有組織有計劃散布毒素破壞新中國；擔任世界反動宗教團體的負責人之一；身為政協代表，對政府政策陽奉陰違；抗拒破壞三自革新，甘心與敵為友……」等罪名，「當場接受群眾的要求」，撤銷其院長的職務。17日，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凌賢揚也公開宣布，撤銷趙氏會長及一切在聖公會華北教區的職務。<sup>224</sup>

自此以後，趙紫宸在中國教會的地位便處於一個較被動的位置。1953年4月，北京三所神學院（即燕京宗教學院、北京神學院、聯合女子聖道學院）合併組成燕京協和神學院，趙紫宸被聘為研究教授。此後，大部分時間趙氏都表現得相當沉默，只在政府或教會需要他出來表態時，他才發表一些零散的言論。<sup>225</sup> 從這些公開發表的言論可見，趙氏基本上已經完全緊隨黨中央及三自運動的路線，他說：「1952年到如今，幾乎十年了；十年之中，我經過了社會主義教育，整風反右，和長期的學習，得到了更大的解放，懂得了更多的真理。」<sup>226</sup> 顯然，連串的政治運動已經把趙氏徹底改變了，他必須學習與接受更多的「真理」。在這樣的情況下，趙紫宸肯定已經揚棄了教會乃時代先知的主張。即使他的「內聖」之學，也在外在政治環境的衝擊下，受到嚴重的扭曲及萎縮了。因為，他一直以來宣稱的基督「新人」，也在政治運動的狂飆及中

<sup>224</sup> 〈趙紫宸嚴重喪失立場〉，《協進》，1952年6月號，頁42。

<sup>225</sup> 如〈關於王明道我提幾個問題〉，《天風》第480至481期（1955年9月），頁14；〈趙紫宸同道的發言〉，《天風》第502期（1956年4月），頁22~23；〈說幾句心裡的話〉，《天風》第532期（1957年7月），頁4~6。

<sup>226</sup> 趙紫宸：〈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頁128。

共的「思想改造」壓力下，<sup>227</sup> 受到嚴重的「閹割」。<sup>228</sup> 在全能政治之下，黨國的力量可以隨意伸展至每一個領域之內，個人的思想空間受到強勢的入侵，是一件非常自然之事。

早在解放初期，趙紫宸已經揚棄了「殉道」的可能，他期望在新中國的時空下，中國教會通過「用愛心建立團契」的努力，可以繼續扮演「證道」的角色。但很快，在「反帝愛國」的衝擊下，他轉而呼籲「守道」，以保住「內聖」之學，期盼將來基督教信仰這「寶貝」仍可發揮功用。只是在急風暴雨的政治運動中，在全能政治主導一切之下，他要真箇持守這個「寶貝」，也面對著相當強大的壓力。即使他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sup>229</sup> 但是他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間，在「左」與「極左」的政治環境之下，卻自覺或不自覺地，已經走上了一條「棄道」的道路。

## 撮要

趙紫宸在中國教會史研究上，一直備受學者關注。但是，對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言行，特別是在改革教會方面的努力，卻因著種種的原因而未受重視。本文從趙紫宸在四十年代以後的思想入手，一方面探討其教會論如何影響他對解放後改革教會的主張，另一方面也嘗試分析趙氏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及對教會獨特使命的探索，如何影響他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並了解他認同新中國的原因。

## Abstract

Zhao Zi-chen (T. C. Chao)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hristian theologians in China. His position in Chinese Church history attracts many researches. Nevertheless,

---

<sup>227</sup> 關於大陸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轉變，特別是中共的「思想改造」運動如何對知識分子「洗腦」，可參Robert J. Lifton, *Thought Reform &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62)。

<sup>228</sup> 陳思和指出，五十年代以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的結果，是凡能生存下來的人，只能是在人文精神方面實行過自我閹割的人。參許紀霖、陳思和等著：〈道統、學統與政統〉，《人文精神尋思錄》（上海：文匯報出版社，1996），頁57。

<sup>229</sup> 參駱振芳：〈趙紫宸博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金陵協和神學誌》，復刊第三期（1985年12月），頁34~35。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government on the eve of Liberation and his participation in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in 1950 was much criticized. Some even suspected him an apostate.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available evidence from 1940s to early 1950s reveals Zhao, as a Christian theologian, responded to the challenge of these turbulent tim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tried to analyze how Zhao's ecclesiology affected his Church reform ideas in 1950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Communism. This writer will also attempt to give a balance explanation on his acceptance of Communist China.